

TIANJIN SHIZHI

敬请各界朋友监督——
在内容上,提高学术性、知识性、
资料性、可读性,加大信息量;
在形式上,活泼多样、美观大方、
图文并茂、新颖明畅;
在文字上,精心校对、求真求实、
字斟句酌、力臻完美。

目录

特载

深刻认识和把握党代会精神 全面推动档案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

——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宣讲 阎峰 (3)

关于在全市地方志系统开展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的通知

..... (8)

廉洁文化

从吉鸿昌的“碗铭”谈共产党人的廉政观 王蔚 (10)

志鉴交流

编修水务志鉴 服务天津发展 丛英 (13)

一部特色鲜明的城市区志

——《天津市西青区志 (1979—2010)》述评 王铁鹏 (19)

中国名镇名村志文化工程申报流程解析 韦恬 (23)

史学百家

由康熙版《静海县志》探究静海先贤于道行 李佳阳 (27)

陈襄于北洋大学初创之贡献 张金声 (32)

杨柳青崇文书院山长及学子初考 刘宗江 (38)

20世纪天津特二区的三家老画报 侯福志 (44)

志述津沽

杨柳青运河旁的小商业 张一然 (47)

明代徐光启在津南农事活动及其意义 张存信 (52)

历史上的宝坻水运 王宗征 (58)

信息动态

市级动态 (61)

区级动态 (63)

天津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王力军到市档案馆 (市地方志办)

调研指导工作 市档案馆宣传部 (封二)

市档案馆 (市地方志办) 举办第二、三期方志大讲堂

..... 市档案馆人事处、方志指导部 (封三)

2022年第4期(总第201期)
(双月刊)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编印单位: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

员会办公室

编 办:天津市地方志馆

编印人员:吴爱民 梁 娜

岳 宏 柳 杨

地 址: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

11号增1号

邮 编:300191

电 话:022-58037686

邮 箱:tjsdagdfzg02@tj.gov.cn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号:

刊型 20210098

承印单位:天津中铁物资印业

有限公司

本期印数:1500册

深刻认识和把握党代会精神 全面推动档案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

——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宣讲

市档案馆党委书记、馆长 阎 峰

(2022年7月15日)

同志们：

按照市委要求，下面我结合自己学习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特别是鸿忠书记的报告精神，从三个方面与大家交流，有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大会的总体情况

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是在我们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满怀豪情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重要历史时刻，在天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和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领袖教导，紧跟核心奋斗，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奋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大会批准了李鸿忠同志代表十一届市委所作的报告，审查批准了中共天津市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共天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和中共天津市第十二届纪

律检查委员会，选举产生了天津市出席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二、深刻把握党代会的主要精神

把握党代会的精神，关键是学习理解把握好鸿忠书记代表十一届市委所作的报告。这篇报告，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和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篇贯穿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这一政治灵魂，顺应时代要求，符合天津实际，反映群众期盼，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时代性、战略性、实践性，是牢记领袖教导、紧跟核心奋斗的政治宣言，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天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行动纲领。

党代会报告共分为五个板块、八个部分，从主旨立意、到谋篇布局、再到行文结构，都呈现出高度的政治站位、坚定的政治方向、鲜明的政治态度、强烈的政治担当。

报告的第一部分，深刻阐释了始终不渝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报告指出，我们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



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性决战中积累的最大政治成果，也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最大政治保证，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亲临天津视察和出席活动，对天津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为天津发展注入了强大政治动力、精神动力、工作动力。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不移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津沽大地的扎实实践。天津发展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大会强调，奋进新征程、开创新局面，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的地位和权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灯塔指引航程，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报告的第二部分，总结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全面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报告指出，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天津发展历程中极不平凡、极为不易的五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我们高举旗帜、维护核心、忠诚担当、创新竞进，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以强烈的政治担当和历史主动，攻坚克难、爬坡过坎、砥砺奋进，解决了许多历

史遗留、群众关切的问题，推进了许多固本培元、守正创新的工作，办了一些打基础、补短板、利长远的大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影响深远的重大变化，“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更加凸显，“五个现代化天津”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如期全面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征程。五年来，我们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党的领导全面加强，政治生态发生根本性变化；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服务重大国家战略取得丰硕成果；坚持把促进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以解放思想为先导，改革开放实现新突破；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美丽天津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深入落实人民当家作主各项制度，民主法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主动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跃上新台阶；坚持筑牢首都政治“护城河”，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建设展现新气象。五年来取得的成绩，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报告的第三部分，深刻分析了面临的风险挑战和机遇优势，擘画了未来五年发展的宏伟蓝图。报告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天津发展既面临前所未有、前所未遇的风险和挑战，也拥有赢得主动、开创新局的机遇和优势，仍然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优势叠加的历史窗口期，处于转型升级的决战决胜期、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争先进位期。做好今后五年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和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记“国之大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质量发展、高水平改革开放、高效能治理、高品质生活为目标导向，以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加快实现“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促进共同富裕，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奋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大会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是高质量发展的大都市、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大都市、高效能治理的大都市、高品质生活的都市。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

报告的第四部分至第七部分，围绕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大都市、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大都市、高效能治理的大都市、高品质生活的都市奋斗目标，提出一系列新的战略任务、重大举措和重要要求。报告指出，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力实施制造业立市战略，全力打造科技创新高地，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区域商贸中心城市，加快构

建双城互动、新区带动、各区联动的区域发展格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优势，加快构建高水平改革开放新格局。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全面推进法治天津建设，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天津，深化社会治理创新，实现高效能治理新提升。要促进共同富裕，促进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办好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教育，提供更加优质的健康服务，构建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创造更加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新期待。

报告的第八部分，对全面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部署，发扬伟大建党精神和自我革命精神，更好担负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时代重任。报告指出，办好天津的事情，关键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键在全面从严治党。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全力建设人才强市，夯实党执政的基层基础，锤炼敢于担当、勇于斗争、善于作为的硬功。要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净化政治生态，将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更好担负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时代重任。

报告最后指出，党的二十大是中国共产党跨入第二个百年奋斗历史进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



军的重要时刻召开的十分重要的大会。要深入开展“迎盛会、铸忠诚、强担当、创业绩”主题学习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定自觉地以党的二十大擘画的宏伟蓝图、确定的大政方针、作出的战略部署、提出的任务举措为行动指南，贯彻落实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全过程、各方面。我们紧跟习近平总书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夺取了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最后决战的伟大胜利，我们坚定紧跟习近平总书记继续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努力奋斗！

大会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团结奋斗、勇毅前行，奋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天津力量！

三、深入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扎实推进新时代档案方志事业创新发展

在市委十二届一次全会上，鸿忠书记代表新一届市委常委会讲话，对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提出七点要求：一是铸就忠诚大德，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二是坚定理想信念，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虔诚信仰、躬身力行，把学习成果转化维护核心、对党忠诚的政治信仰。三是坚守初心使命，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永远做人民的“孺子牛”、勤务

员。四是强化担当作为，要竭尽担当之心力，提升担当之境界，争作担当之表率。五是深入调查研究，眼睛向下、扑下身子，直奔基层、直插现场，使决策更科学。六是加强团结统一，坚持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各级党委（党组）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自觉坚持民主集中制，全面提高集体领导、集体决策水平。七是勇于自我革命，切实担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持续净化政治生态。

档案记载着中国的历史、传承着伟大建党精神。作为新时代档案方志人，我们要时刻牢记档案工作姓“党”政治属性，强化政治机关意识，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统领地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严明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抓好市党代会精神贯彻落实。我们要认真落实市委和鸿忠书记要求，不断增强贯彻落实市党代会精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强烈的政治担当、有力的行动举措、务实的工作作风，把党代会精神贯彻落实到档案方志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征程上展现档案方志之为。

（一）提高政治站位，全面深入学习宣传党代会精神

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市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和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档案工作重要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同深入开展“迎盛会、铸忠诚、强担当、创业绩”主题学习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工作结合起来，同深入推动巡视问题整改工作结合起来。馆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要发挥领学促学作用，各党支

部、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和全体党员干部要注重将党代会精神同岗位工作实际紧密结合，带着问题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确保党代会精神入脑入心、落地见效。要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纳入馆各类教育培训之中，采取集中培训、专题研讨、辅导讲座、在线学习等多种形式，不断深化学习效果，推动党代会精神走深走实。

（二）坚持对标对表，认真谋划好贯彻落实具体举措

报告指出，“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加快长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加强历史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提升博物馆、档案馆、纪念馆、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宣传教育水平，全面展现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底蕴。”这是市委对档案馆给予的厚重期望，也是对我们的鞭策。我们要紧扣党代会报告中关于今后五年工作的总体要求，在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中展现档案方志新作为。要加强红色档案资源建设，全方位收集反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档案史料。在建设全市红色资源档案信息平台上，推进全市红色资源整合共享。发挥红色教育阵地作用，积极开发利用馆藏红色资源，组织开展“喜迎二十大 档案颂辉煌”主题宣传活动，结合档案方志“六进”活动，走进基层单位开展红色宣传教育，向社会推出一批精品佳作。要助力文化强市建设，围绕天津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老字号”、大运河文化、长城文化、“两院”院士等开展特色档案史志资料征集工作，依托馆藏特色档案方志资源，推动出版“津味”史志作品，展现历史文化名城底蕴。要

加大档案方志开放力度，积极对接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加强全市民生档案“一站式”平台建设，依法分期分批向社会开放档案。在深化数字档案馆建设上下功夫，拓展掌上年鉴试点，满足人民群众用档读志需求。

（三）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站稳“第一方阵”

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政治任务，强化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带头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引导党员干部群众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厚植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要深入开展“迎盛会、铸忠诚、强担当、创业绩”主题学习宣传教育实践活动，不断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结合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健全和完善联系群众长效机制，落实“进群、入群”要求，不断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增进与群众的感情。要有保持时时放心不下、日夜思之虑之的责任心，强化责任担当，重事功、善事功、练事功，锤炼敢于担当、勇于斗争、善于作为的硬功，切实把党代会精神贯彻落实到档案方志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确保党代会确定的重大决策部署和各项目标任务在档案馆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同志们，当前我们全年的工作正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时间节点，要搞好工作统筹，用心思考，潜心谋划，对照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进一步查找不足，理清下阶段发展思路，细化目标任务，明确工作职责，一级一级抓好落实，真正领会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的精神要义和时代要求，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强化使命意识、责任意识，确保馆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关于在全市地方志系统开展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的通知

各区地方志机构、市各有关单位：

地方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记述形式。为深入贯彻落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进一步提高地方志服务新时代的质量和水平，营造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良好氛围，按照《关于在全国地方志系统开展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的通知》（中指办字〔2022〕41号）要求，经研究，决定在全市地方志系统开展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贯彻落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地方志存史资政育人作用，切实担负起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使命，挖掘历史智慧，记录时代征程，讲好党的故事、中国故事、天津故事，不断推进文化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为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贡献方志力量，以方志之为营造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良好氛围。

二、任务安排

1.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对地方志工作重要论述和党中央有关部署要求。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重要论述和关于地方志工作重要论述，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档案工作、党史学习与研究、文化遗产保护重要论述摘编》。认真学习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央宣传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等。以集中学习、个人自学、交流研讨等形式，扎实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见成效。立足本单位、本部门工作实际，找准结合点和着力点，进一步发挥地方志在记录、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独特作用。

2.以方志“六进”活动为载体，大力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地方志文化宣讲活动。举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地方志文化讲座，组织开展读志用志、读鉴品鉴活动。深化拓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结合开展支部共建

活动、志愿服务活动，组织业务骨干，走进机关、农村、社区、校园、企业、军营，宣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津历史文化和地方志文化，讲深讲透红色故事、中国故事、天津故事，教育引导基层党员干部群众自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社会公众对地方志工作的关注度。

3.发挥阵地平台作用，深入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地方志理论研究。编报好《档案方志参阅》，围绕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研究策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选题，发挥资政辅政作用。高质量编辑出版《天津史志》，围绕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刊发理论文章，各区地方志办要积极投稿，进一步提高稿件质量。积极参与第十二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等征文活动。与高校、科研机构加强沟通合作，组织开展学术研讨等活动，不断提升地方志学术科研水平。

4.扎实推进重大专题志编修和地方史编写工作，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地方志文化产品。积极推动《天津抗日战争志》《天津全面小康志》编修。按照《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实施方案》《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实施方案》，推动名镇、名村志文化工程。探索和完善地方史编著工作模式，加强对地方史业务指导。资助出版“天津地方史研究丛书”，强化精品意识，挖掘城市历史文脉，打造天津文化名片。

5.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做好宣传，提高天津地方志工作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加强与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的联系，持续做好天津地方志工作以及地情资源的宣传，及时发布地情资源、方志信息动态、地方志文献查阅

服务举措等。积极向中国方志网、方志中国微信公众号投稿，在全国层面传播天津方志好声音，展现天津方志人新作为。拓展新媒体宣传渠道，优化网站、微信等平台建设，开设抖音等新媒体账号，积极参与“你好，天津”短视频大赛，挖掘档案史志资源，讲好天津故事，展示天津形象。拓宽年鉴阅读方式，继续推动有条件的区开发掌上年鉴工作，打造载录历史、传承文化、服务群众的公众信息服务平台。

三、工作要求

1.提高政治站位，服务工作大局。要将开展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与迎接服务党的二十大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结合起来，与深入开展“迎盛会、铸忠诚、强担当、创业绩”主题学习宣传教育实践活动结合起来，立足地方志工作实际，运用史志资源，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在服务党委和政府工作大局中展现方志之为。

2.落实防控要求，创新活动形式。要紧密结合全市疫情防控形势，对活动安排进行动态调整，灵活创新线上线下活动形式。要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因地制宜，统筹兼顾，点面结合，突出重点，开展一系列彰显地方志文化和本地区特色的活动。

3.做好宣传总结，报送活动情况。各单位在开展好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的同时，要加大宣传报道力度，总结交流有益经验做法。请各单位于2022年9月30日前将活动开展情况（电子版）报送市地方志办，内容简明扼要，着重介绍亮点，突出特色。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8月3日



从吉鸿昌的“碗铭”谈共产党人的廉政观

王蔚

“作官即不许发财”，这是著名爱国将领、抗日英雄吉鸿昌的父亲吉茂松先生对儿子的谆谆教导。吉鸿昌将这句话绘制在饭碗上，并时刻监督自己的言行。这句“碗铭”一直提醒着吉鸿昌要清廉、尚德、为民，在日后的不断与共产党人的接触中，吉鸿昌被中国共产党人勤俭节约、清正廉洁的品质深深感染与影响，更加坚定了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作官即不许发财”的人生准则和廉政观念也反映着共产党人执政为民、清正廉洁的初心。

一、廉洁家风树立吉鸿昌爱国情怀

吉鸿昌与天津颇有渊源，他的故居坐落在天津市和平区花园路5号的一所三层小洋楼，现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这所小楼又名“红楼”，始建于1917年，砖木结构，总建筑面积1000余平方米。1934年5月，吉鸿昌在天津组织成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参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把自己的住所作为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在家中印刷出版宣传抗日的刊物《民族战旗》。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不止有“我何惜此头”的大无畏精神，更有“作官即不许发财”的清廉思想。

1895年10月18日，吉鸿昌出生在河南省扶沟县城东北10公里处的吕潭镇。吉鸿昌的

父亲吉茂松（又名吉筠亭）在镇内高台开有一座小茶馆，在当时收入十分有限，家庭生活很贫困。吉父为人豪爽，性格豁达，爱打抱不平，喜欢帮助乡亲解决困难，人缘颇好。吉鸿昌六岁时，母亲不幸离世，他担负起帮父亲经营茶馆养家糊口的重担，捡柴种地、卖烟丝、捡庄稼，不到10岁就成为父亲的得力帮手，茶馆中的各项事务都应付自如。茶馆中的顾客经常高谈阔论，说古论今，吉鸿昌的父亲经常加入其中，一起谈论救国救民、富国强兵，抒发对国事的见解。在这种氛围下，吉鸿昌十分仰慕“收拾旧河山”的岳飞，“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的花木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这种环境熏陶下，在父亲性格的耳濡目染下，吉鸿昌逐渐形成了爱国、救国、刚正、清廉的品德。

1913年，吉鸿昌怀揣“是好男儿，舍身报国”的报国从军之志应征入伍，加入了冯玉祥的军队。他在战斗中勇猛果敢，深受冯玉祥赏识，被输送到模范连当学兵，之后升任手枪连连长。1920年5月，吉鸿昌的父亲病重，他急忙从部队返回家乡看望父亲。吉老先生在弥留之际嘱托儿子说：“你为人正直、做事勇敢，这些我都放心。但是我有一句话要你记住，以

后作官要清正廉洁，多为天下百姓着想，作官即不许发财。”“作官即不许发财”这句话吉鸿昌牢牢记在心里。

回到部队后，吉鸿昌将“作官即不许发财”这七个字绘制在碗上，让陶瓷厂仿照烧制了500个，发给下属每一位军官。他在赠碗仪式上对广大官兵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我绝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家父教诲，作官不为发财，要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此后，他经常把写有“碗铭”的细瓷碗带在身边，时刻提醒自己，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在吉鸿昌的军旅生涯中，他官阶逐步提升，但始终保持“爱国清廉”的初心，一直将“作官即不许发财”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和为官准则。他谨遵父亲教诲，为天下穷人考虑，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将节省下来的钱都用在造福一方、兴办公益上。1926年，吉鸿昌在绥远驻军兼任省警务处处长的时候，发现交通要道——蜈蚣坝非常危险，当地百姓出行不便，甚至经常出现事故。吉鸿昌便拿出自己的积蓄，带领士兵与百姓一起开拓了一条宽阔大道，解决了当地百姓的出行难题。人们感恩吉鸿昌的功绩，为他立碑纪念。

童年的廉洁家风养成了吉鸿昌“正直爱国”的性格。在部队中共地下党员的安排下，吉鸿昌进入苏区考察，被共产党人清正廉洁、勤俭节约的风格深深感染，感叹苏区祥和安宁的生活气氛，使他提升了思想觉悟，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回到部队他下令自己的士兵不准“枪口对内”。此后，吉鸿昌多次积极申请入党，并于1932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古代廉政文化对共产党人廉政观的影响

吉鸿昌作为抗日民族英雄、爱国将领，一

生仰慕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秉承“清廉爱国”的思想，廉洁奉公、两袖清风，这与他严格的家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古代廉政思想对共产党人廉政观的影响具有深远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义廉耻”被视为“国之四维”。在《管子·牧民·国颂》中写道：“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其中“廉”即是“廉政观”的道德要求。中国古代的廉政观强调“治政廉为首”，即为官执政要把清廉放在第一位。《说苑·政理》中就提出了“廉平之守”的思想，孔子告诫即将出任信阳长官的子贡：“临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即作官没有比公平更好的德行了，面对财富没有比清廉更能可贵的品德了，守住清廉公平的底线，为官自然不会被腐败攻破。《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中也对廉政观进行了阐述：“廉者，政之本也。”《后汉书·杨震传》记载了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杨震为官廉洁自律，以“清白”传家，从前举荐的荆州秀才王密担任昌邑县令，深夜拜访并赠送黄金十斤，杨震严词拒绝说：“我了解你，你却不了解我，这是为什么呢？”王密说深夜没人知道，而杨震正色严词道：“怎么没人知道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北宋包拯为官清廉，铁面无私，不畏权贵，也是我国古代廉政文化思想的杰出代表。

《论语·为政》中记载：“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为官执政要清正廉洁，这样才有正气，执法才能硬气，百姓才会信服。可谓“公生明，廉生威”。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廉政文化思想，清廉是一种高



尚的品德，可以说，廉政与贪欲相对，清廉与品德相成，“清廉尚德”是古代廉政文化思想的根本，对共产党人廉政观的形成有着深远而重要的影响。

三、为民理念是共产党人廉政观的思想根源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施廉政、得民心，“廉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秉承的理念和初心。周恩来同志一生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他的一件大衣缝缝补补，夏天挡雨，晚上作被子保暖，冬天御寒，陪着他走过了艰难困苦的革命岁月。1943年3月18日恰逢周恩来45岁生日，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坚决而委婉地拒绝了同志们为他准备的生日食物，只要了一碗面，以此满足同志们为他庆生的心愿。随后他提笔写下《我的修养要则》。《我的修养要则》投射出周恩来“清正廉洁、严于律己”的人格魅力，也成为我们共产党人加强党性修养的珍贵素材。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一生清廉，他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时，坚持和其他人共用一张桌子、一条长凳办公，合在一张硬板床睡觉，和学员吃一样的伙食。他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给党校学员树立了好榜样。地委书记孔繁森省吃俭用把节省下来的钱捐赠给贫困儿童，为群众买药时出手大方，少则百十元钱，多则上千元，而他牺牲时身上却只有现金8元7角。人民的公仆——焦裕禄强忍病痛踏遍了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只为兰考人民治理风沙。“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正是他“廉洁为民”的真实写

照，也树立了中国共产党亲民爱民、清正廉明的良好形象。

“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欲流之远，必浚其源。”人民群众是共产党人力量的源泉。在与群众广泛深入的接触中，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朴素的群众廉政观。在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945年，中共七大把“为人民服务”提炼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回顾史上历次革命战争，都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取得的最终胜利，即“兵民是胜利之本”。只有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赢得人民的信任，才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民之所望，政之所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党依靠群众、引领群众，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辉煌奋斗历程。这些无不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也是共产党人廉政观的思想根源。

“作官即不许发财”是最朴素的廉政观，而情系百姓、为民谋利是共产党人的底线，“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今天更需要大力弘扬吉鸿昌的“碗铭”所蕴含的清廉尚德思想，增强廉政意识，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线和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在不懈奋斗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新的荣光。

(作者单位：平津战役纪念馆)

编修水务志鉴 服务天津发展

丛 英

天津缘水而生，依水而兴，记述水事是城市发展的必然需求，天津成势在水，天津水务志、天津水务年鉴的编纂，为天津这座总面积11966.4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达1386.60万人^[1]的北方超大城市的发展，发挥了志鉴应有的“资政、存史、教化”作用。

一、水务志鉴编纂，是天津城市发展的迫切需要

天津地处华北平原的东端，濒临渤海。天津的脱颖而出过程是河系水流长期冲积和海进、海退多次往复的过程。由于黄河和其他有关河流几次较大的变迁和人为作用，使得海河流域逐步形成独立水系。经过漫长的沧海桑田，生态演化，而颖现其“九河下梢”河网之格局和陆地之轮廓。天津的形成、发展与海河有着不解之缘，与水息息相关。海河是一条多功能的河道，有利也有害。但人们首先认定海河是一条施惠于天津的河，并把海河称为天津的“母亲”河。

天津又因水而扰。天津的西部地区汛期降水集中，加之天津处于众多河流末梢，汛期诸河上游水多时，顺势倾泻而下，造成天津聚流成灾。在枯水期，上游来水少，甚至断流，又因本地水资源匮乏，多出现寡水干旱的灾难。

滨海一带又常遭受风暴潮的肆虐。因而洪、涝、旱、碱、潮等灾害，多年困扰着天津民众的生存，制约着天津经济的发展。

因此，全面详细记录天津水利建设与管理的历史、发展和现状，编纂出版兴水利、除水害史实的天津水务（水利）志鉴是天津城市发展的迫切所需。

二、史料需经编纬系，才会熠熠生辉泽被万代

修志工作是历史赋予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一项重要的执政职责。水务局的修志工作，始终坚持党组领导，编委会组织实施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天津市地方志工作办法》，树牢“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宗旨。

修志之初，就成立了天津水利志编纂委员会，下设编辑办公室，负责全市水利系统修志工作。编委会主任由局长担任，副主任由主管修志工作的副局长、总工等担任，之后多次调整编委会。局属各单位及各区县水务（利）局也相应成立修志工作小组，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分管负责人任副组长，配备专人从事编纂

[1]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年鉴（2021）》，《天津年鉴》编辑部出版发行，2021年12月，第52—53页。



工作，全力组织推动本单位修志工作。把修志工作纳入单位年度目标管理和考核范围，主要负责同志亲自过问，对修志工作负总责，并从组织机构、办公条件、修志人员、工作环境、工作经费等方面给予关心和支持，做到认识到位、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编制到位、经费到位、设施到位、规划到位、工作到位，即“一纳入、八到位”。

资料真实、准确是志书的根本和价值所在。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我们始终把质量意识、精品意识贯穿到修志工作大纲设计、资料搜集、初稿撰写和志稿审定的全过程。搜集资料过程中，编辑人员查阅了档案、水务信息、工作总结、发表的刊物及有关书籍，并走访询问知情人、当事人、历史见证人的口碑记录。对搜集到未形成文字记载的口碑资料，进行认真分析、鉴别、整理后入志使用，弥补资料的不足。据统计，为完成《天津市志·水务志》的编纂约收集 5000 余万字资料。修志工作中始终以史料经编纬系，努力编纂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志书。

按照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和水利部的部署，首轮修志中水务局完成了《天津通志·水利志》，并完成天津水利志丛书 17 卷，包括：《天津水利志》《海河干流志》《引滦入津工程志》《于桥水库志》《北大港水库志》《蓟县水利志》《宝坻县水利志》《武清县水利志》《宁河县水利志》《静海县水利志》《塘沽区水利志》《汉沽区水利志》《大港区水利志》《东丽区水利志》《津南区水利志》《西青区水利志》《北辰区水利志》。全套丛书约 590 万字，均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志书记述内容上限追溯到有文字历史可查的年

代，即周定王五年（前 602）黄河改道在天津入渤海，下限断至 1990 年。



天津水利志丛书

二轮修志在完成《天津市志·水务志》的同时，完成了天津水务志丛书 11 卷，包括：《天津水务志》《大港区水务志》《东丽区水务志》《津南区水务志》《西青区水务志》《北辰区水务志》《武清区水务志》《宝坻区水务志》《宁河县水务志》《静海县水务志》《蓟县水务志》。天津水务志丛书，内容上限自 1991 年，下限断至 2010 年。全套丛书约 612 万字，均由中水水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水务志丛书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综合运用。《天津



天津水务志丛书

水务志》结构为篇、章、节、目，志书卷首为照片彩图，由凡例、综述、大事记、正文13篇及附录、索引、编后记组成。资料来源以档案及文献资料为主，外调材料、口碑资料为辅，坚持精推细敲、存真去伪，客观、真实、系统地反映了1991—2010年天津在治水管水中水务改革、发展、奋进的历程。

两轮志书的编修可谓统合古今，是天津有史以来编著的水利专业志书，它的出版发行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天津水利的历史和现状，对促进天津水利事业发展，扩大天津水利影响力裨益良多。



《天津通志·水利志》 《天津市志·水务志》



天津水利（水务）年鉴

首轮修志使我们意识到资料的重要性，经局党委会研究，决定编纂《天津水利年鉴》。《天津水利年鉴》于1997年创刊，至今已经连续出版26卷，因机构变化，《天津水利年鉴》于2010年更名为《天津水务年鉴》。年鉴的编纂工作从无到有，逐步成熟，质量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在局领导的支持下，2017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之后每年均以招投标形式确定出版单位。

为贴合实际工作的新情况，水务年鉴的编写采用分类编辑法，主体内容分类目、分目、条目三个层次，后附索引。在保持年鉴框架基本稳定的同时，据所在纪年水事的内容，进行部分类目、分目、条目的调整，以期符合事物发展实况。例如《天津水务年鉴（2020）》，就将“防汛抗旱”类目更名为“水旱灾害防御”，“工程管理”类目调整为“水利工程管理”，增加“涉河项目审查”“取土采砂管理”等条目；将“工程管理”类目中的“南水北调工程”调整为“南水北调市内配套（引江）工程管理”，同时增加“综合管理”“供水管线管理”“永清渠泵站管理”等分目。一年一卷的年鉴，既





充分反映了水务工作发展脉络及主要成就，又起到了“鉴往知来，服务现实、保存史料、惠及后代”的重要作用，为社会各界人士了解天津水务、研究天津水务提供资料，更为续修志书积累了大量宝贵资料。

三、志鉴双辉，服务天津经济社会发展

（一）志鉴的存史作用

志鉴作为资料性工具书，记录了天津因水而发生的社会变化。洪、涝、旱、碱、潮灾害给天津城市打上了烙印，尤其水灾使城市满目疮痍。明万历二十年（1592）至1949年的358年间，天津发生大的水灾43次，平均8年一次。其间，有13次淹及天津城区。1939年的水灾，致天津市区70%~80%的街道水深1~2米，被水泡了两个多月，电车停驶、供水中断、电话不通、学校停课、仓库物资霉烂，80多万人受灾，房屋倒塌数万间。在洪灾过程中，还多发生沥涝灾害，一些年份还伴有风暴潮灾，强风暴潮多使沿海庐舍、禾稼、盐滩被淹。干旱年份，天津又受水资源短缺的困扰。明成化八年至民国三十七年（1472—1948）的477年间，天津地区发生干旱灾害157次，平均3年发生一次旱灾。虽如此，人们不断兴利除害，通过屯田、漕运、疏导河流、引水灌溉、水产养殖等使天津具备了河口海港城市的形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除水害兴水利”的70多年人类实践，使得天津这座城市成为中国北方城市的一颗靓丽明珠。

1963年11月17日，毛泽东主席题词“一

定要根治海河”。天津市对海河流域进行全面规划和综合治理，增辟新的入海通道，改变洪水集中从天津宣泄入海的局面。天津的城市防洪圈由永定新河右堤、独流减河左堤、西部防线和防潮堤组成，全长250.75千米，保护范围为中心城区、环城四区和滨海新区大部分地区，保护面积达2700平方千米。截至2010年，防洪圈实现全线封闭。城市防洪标准由不足5年一遇提高到20年一遇，中心城区防洪标准达到200年一遇，防潮堤防洪标准一般达到20年一遇，重点段达到50年一遇。^[1]

1983年建成“引滦入津”跨流域调水工程。工程从潘家口水库可分配水量19.5亿立方米中给天津城市用水10亿立方米。工程于1982年5月全线开工，1983年9月建成通水，工期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全长234公里，包括开凿12公里隧洞，整治108公里河道，开挖64公里专用明渠，修建26公里暗渠，兴建5座大型泵站，12座穿河、渠倒虹吸和沿线的闸、涵、桥梁工程，加固于桥水库和新建尔王庄水库，以及变配电和通信线路架设等215项工程。这项当时为国内首例跨流域最大的城市供水工程，建设速度快、质量优、投资省，得到党中央充分肯定，被国家质量评审委员会评为1984年国家优质工程，授予金质奖。在设计、施工和基建管理方面采用多项新技术，1987年获得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2]

随着城市发展，供水压力凸显。为缓解供

[1] 天津市水务局著：《天津水务志（1991—2010）》，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9年12月第1版，第4页。

[2] 天津市水利局水利志编纂委员会：《天津水利志》，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6—7页。

水压力，实施了引黄济津应急调水。2000—2010年，天津先后6次从黄河应急调水。6次引黄济津调水总量为22.81亿立方米，除2000年外，水质总体达到Ⅲ类水以上标准。^[1]

21世纪初期，天津开始打造城市供水的第二条“生命线”，即南水北调工程。2003—2014年，南水北调中期干线工程完成。2006—2014年，天津市内配套工程消纳南水北调中期一线工程设计规模的建设项目完成，与中线干线工程同步发挥效益。2014年12月27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通水，引江水自丹江口水库，经河南、河北进入天津。引江水的到来，不仅使天津水资源保障能力实现了战略性突破，构架起了一横一纵、引滦引江双水源保障的城市供水格局，还有效提高了天津城市供水水质，引江水质常规监测24项指标始终保持在地表水Ⅱ类及以上标准，并在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改善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综合效益。^[2]

进入21世纪以来，由强降雨造成的城区多地灾难性内涝，引起社会极大关注。随着天津危房改造、地铁和快速路修建、房地产开发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城区排水系统快速发展，雨、污水排放能力大幅提高，排水服务面积不断扩大。截至2010年，城区污水排放划分为纪庄子等六大系统，管网服务面积达246.36平方千米，占城区面积的87.99%，雨水污水排放划分为海河干流等九大系统，管网服务面积为218.18平方千米，占城区面积的77.92%。^[3]

以上种种实践，凝聚了一代又一代水利

(水务)人的智慧和汗水，打造了一座“水清、岸绿、景美”的北方大都市。

(二) 志鉴的资政作用

志鉴的资政作用，为天津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专业参考依据。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珍贵资源。水务行业是由原水、供水、节水、排水、污水处理及水资源回收利用等构成的产业链，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基本服务行业之一。天津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一环，要承担起党中央赋予天津“一基地三区”的功能定位，成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水务行业的工作必要做得实、做得稳。天津水利(水务)志及逐年编纂的年鉴为天津水务行业留存了珍贵文献史料，为水务事业各方面工作提供了得失之镜。通过志鉴的编纂发行，传播交流水务建设管理经验，架起行业内外宣传桥梁，树立水务行业良好形象。

历史可以照亮未来。修志以传承，读志以资政，编志以谋长远。读志用志，不仅限于水务专业人员，而且扩展到社会上的广大读者，从一张老照片、一张老工程图、一个老水文器具的图像，看到了一代代水务人留在祖国大地上的鲜活印记，并以此资政当下。水务局在制定“水利规划”“水资源规划”时，以《天津水利志》为基础，了解河道及水利设施的基本情况。海河水利委员会水保局在做“水环境保护”课题时，从《天津水利志》中查阅资料。市政设计院在海河改造、地铁穿河等工程建设

[1] 天津市水务局著：《天津水务志（1991—2010）》，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9年12月第1版，第3—4页。

[2] 天津市水务局著：《天津水务志（1991—2010）》，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9年12月第1版，第3页。

[3] 天津市水务局著：《天津水务志（1991—2010）》，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9年12月第1版，第5页。



中，以《天津水务志》为基础资料制定方案。在大运河申遗以及制定大运河规划时，都查阅了《天津水利志》，从中获取了大量的历史资料。2004年8月，中央电视台制作“话说永定河”节目，专门来津采访，从《天津水利志》中了解永定河、永定新河的水文化情况。另外，在《天津水利志》《天津水务志》《天津水务年鉴》的基础上，我们深挖志鉴资源，完成了《中国水利百科全书》《中国水利系统组织沿革》《中国河湖大典·海河卷》《中国城市防洪》《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水利卷》《天津水旱灾害》《南水北调丛书》《天津市兵要地志》《中国运河史》等书籍中天津部分篇章的稿件。目前，“修志为用”的服务理念，已融入行业和社会，为促进天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志鉴的教化作用

志鉴的教化作用，令人深刻体悟天津城市发展变迁的历史脉动。

志鉴以书的形式，为党立言。在志鉴的字里行间，在记述客观事实的文字里，一代代水务人用朴实无华的智慧在津沽大地上树立起一座座水利丰碑和一处处生活美景。滦水入津，结束了天津人喝苦咸水的历史。引滦入津工程纪念碑矗立在海河的起点，即：子牙河、南运河与海河交汇处的三岔河口岸上，上面刻着邓小平1986年8月20日亲笔题写的“引滦入津工程纪念碑”九个大字。引滦入津工程凝聚了引滦精神：“为民造福的伟大思想，顽强拼搏的革命斗志，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团结协作的高尚风格，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水生态环境治理和海河堤岸景观改造工程，

基本清除了中心城区和周边地区的黑臭水体，达到了“清一条河，建一道景”的效果，使得穿城而过的海河两岸成为“水清、岸绿、景美”的家乡景观。

水形态、水工程、水工具、水环境、水景观等，从物质层面折射了一个城市水文化的视野，它随着城市的发展，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辅相成、相互成就。翻阅水利水务志鉴，触目一座座惠民的水利设施，人们深刻地体会到城市的发展、变迁和厚重的历史脉动。

2022年距《天津水务志》下限又过去了12年，三修水务志即在不久的将来。回顾两轮修志工作经验，依然要坚持三点：一是领导重视是做好修志工作的前提；二是总结经验、学习先进是做好修志工作的保障；三是选好用好修志人员是做好修志工作的基础。

修志编鉴工作是一项艰苦、细致、复杂、浩繁的工作，完成此项系统的水文化建设工程责任重大且光荣。希望通过学习、交流，以出版高质量的志鉴服务我们所处的时代。

参考资料：

- [1]天津市水利局水利志编纂委员会：《天津水利志》，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 [2]天津市水务局著：《天津水务志（1991—2010）》，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9年12月第1版。
- [3]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年鉴（2021）》《天津年鉴》编辑部出版发行，2021年12月。
- [4]天津市水务局编：《天津水旱灾害》，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 [5]天津市水利局编：《天津水利年鉴》。
- [6]天津市水务局编：《天津水务年鉴》。

（作者单位：天津市水务局）

一部特色鲜明的城市区志

——《天津市西青区志（1979—2010）》述评

王铁鹏

《天津市西青区志（1979—2010）》（简称《西青区志》）是天津市西青区的第二轮续志。该志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了西青区1979—2010年的发展历程，观点正确，体例严谨，资料翔实，内容全面，行文规范，印制精美，特别是突出了杨柳青年画、精武文化和“赶大营”等地域文化特色，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城市区志的专业特点，为城市区志的编纂以及如何续修积累了经验。

一、突出地域文化特色

《西青区志》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多种方志体裁，浓墨重彩地记述西青区的地域文化，展现了西青区厚重的文化底蕴，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前插地图中，除了位置图、区划图、交通水乡图等常规地图外，还有一幅反映西青区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地图。在这幅旅游地图中，清晰地标注了杨柳青古镇、霍元甲老家、石家大院等反映西青地域文化的旅游景点，反映了这些文化元素的分布。此外，在前插照片中，以较大篇幅登载了反映西青地域文化的杨柳青大院区、杨柳青古镇御河景区等照片，这些照片多是横贯通栏，美观大气，更加突出了西青区的地域文化特色。

概述采取特点式记述方式，设五个部分，突显西青区特点特色，其中两个部分反映西青区的地域文化特色，可见地域文化在西青区的分量。概述的第一部分是底蕴丰厚的特色文化区，记述了杨柳青年画、精武文化以及杨柳青人“赶大营”等文化遗产。西青区是全国著名的木版年画之乡、武术之乡，“赶大营”为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做出重要贡献，这些都在西青区占有重要地位，应当给予充分记述。概述在记述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还记述了在该志断限时间内，对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传承，时间一直延续至该志下限。概述的第四部分是人文特色旅游区，记述根植于西青区历史文化遗产上的旅游业，快速发展为杨柳青民俗、中北生态、峰山旅游度假、霍元甲精武、辛口生态民俗5大旅游区，成为天津人文旅游最集中和最丰富的热点地区。发展特色旅游，实际上是对优秀地域特色的宣传、弘扬和开发利用。

在大事记中，以时间为轴，纵向记述了西青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利用和传承的过程。如记述了1979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天津杨柳青画展；1985年，在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举办霍元甲生平事迹展；1989年，霍元



甲陵园竣工；1992年，首届中国天津杨柳青国际年画艺术节在杨柳青博物馆开幕；2005年，杨柳青大院文化区、霍元甲精武文化旅游区等十余个旅游项目启动；2006年，杨柳青年画入选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等。

在正文第一篇建置之前，该志以专题形式特设“西青异彩”于卷首，记述杨柳青木版年画，武林双杰霍元甲、韩慕侠，杨柳青人赶大营等内容，这种记述方法在其他志书中并不常见。在记述中，既注意突出地域文化的历史和源流，也注重保护、传承和复兴；既客观记述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记述了遇到的坎坷和挫折，但无论怎么说，这三项遗产都是西青文化的特色品牌和新时期西青文化建设的原动力，所以放在全志最重要的位置、放在首编加以记述，突显西青地域特色文化在全志的地位和分量。

此外，该志在第三十一编社会生活中设置风俗民情章，记述了西青区的生活习俗、礼仪习俗和岁时习俗；设置方言、谣谚章，记述西青区的方言、民谣、谚语，反映了西青区人民群众在劳动和社会生活实践中不仅保留和传承了传统习俗，还革新并派生出新的内容，成为西青地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突出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

改革开放是最鲜明的时代特征。《西青区志》上限是1979年，正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第一年。西青区40多年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是最强大的推动力，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西青区的快速发展。该志把改革开放作为全志记述的重点，把发展作为记述的主题、主线，采取集中记述与分散记述相结合的方式，记述了西青区改革开放的伟大

实践。

在集中记述方面，概述的第二部分是开发开放先行区，记述了西青作为天津市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率先成立经济技术开发区，采取多种措施把开发区做大做强，成为天津市区县级第一家国家级开发区。概述的第三部分是经济活力强劲区，记述了西青区1978年以后，由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实际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是改革开放在西青区的一场伟大实践。概述中记载，到2010年，全区生产总值增长500余倍，财政收入增长近278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78倍，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这足以见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为了突出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该志设置经济体制改革专章，分别记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工业体制改革、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涵盖了改革初期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全面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阶段，突显了西青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设置招商引资专章，记述了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政策、招商方式和招商成果，反映了对外开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实践过程。

在分散记述方面，改革开放深入到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在各个编章节中，都能见到改革开放的印迹以及带来的深刻影响。比如，在第五编城乡建设中，设置城建体制改革规划章，记述了用地制度改革、资金投入机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在第十三编商业服务业中，设置流通领域改革章，记述了经营体制改革、商业结构变革；在第十四编财政税务中，记述了财政体制改革；在第十六编综合经济管理中，记述了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统计制度改

革、价格管理体制改革、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在第十九编人民政府中，记述了政府机构改革；在第二十四编教育中，专设教育改革章，记述了教育体制改革；在第二十五编科学技术中，记述了科技体制改革；在第二十九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中，记述了人事制度改革。

西青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与中共西青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人民政府、区政协的重视、努力是分不开的。据《西青区志》记载，在每次党代会工作报告中，改革开放都是主题、主线。如1986年召开的第四次党代会报告主题是《深入进行农村改革，全面加强党的建设》，1992年召开的第六次党代会报告主题是《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 奋战五年 再展宏图》，1997年召开的第七次党代会报告的主题是《解放思想 抢抓机遇 把西青区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在记述区委重大决策中，记载了区委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深化企业改革、扩大乡镇企业自主权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面的改革举措。

在人民代表大会的记述中，记载了西青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围绕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听取和审议相关报告，开展调查研究，其中涉及外向型经济发展、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劳动就业、农村生产、市场价格等方面，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在人民政府的记述中，专设重大施政纪略一章，记载了在区委领导下和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监督下，西青区人民政府推行农业生产合作制、工业改造重组、乡镇企业“六权下放”、发展集体和个体商业、发展集市贸易、发展“三资”企业等方面采取的重大举措，这

些重大举措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落在实处，进一步提升了西青区经济竞争力。

在政治协商会议的记述中，记载了西青区政协在区委领导下，围绕西青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为西青区经济建设献策助力。据《西青区志》记载，在政治协商方面，每年都要围绕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与区委、区政府领导进行面对面协商讨论，提出意见建议。在调研提案方面，提交了关于大力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等提案，进一步促进了西青区经济发展。

三、突出城市区志的编纂特点

市辖区是城市的组成部分，带有局部性、从属性、不平衡性、相对独立性和非稳定性等特征。城市区志不同于传统的县志，编纂的历史较短，理论和实践均在探索之中，是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的重点、亮点，也是难点。《西青区志》在城市区志编修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尝试，为城市区志编修提供了新鲜经验和借鉴。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繁衍的基础，也是城市建立和发展的条件。但由于认识上的原因，一些城市区志对自然环境的记述比较薄弱。一些同志盲目地认为，市辖区是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具独立性，因此在编修城市区志中往往把自然环境忽略掉，有的甚至不记地质地貌、气候水文等要素，有的不记自然资源和自然灾害，或轻描淡写。实际上，自然环境对于城市辖区来讲也是十分重要的，与城市的创立、兴起、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西青区志》专设自然环境编，对地理环境、自然资源、自然灾害的记述比较完整、系统、到位。比如在地理环境中，记述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动植物；在自然资源中，记



述水资源、土地资源、地热资源；在自然灾害中，记述洪涝冰雹、干旱干热风、风霜虫灾等，使读者对西青区自然环境有了全面而清晰的认识。

城市建设是城市区志记述的重点，也是城市区志有别于县志的重要方面。《西青区志》在内容排列顺序上，把城市建设版块前置，放到建置、自然环境、人口之后，经济版块之前，突出西青区作为城市辖区的特征和特点。在城市建设版块中，《西青区志》设置基础设施、城乡建设、水利电力、运输邮政电信、环境保护五编，用较大篇幅记述西青区城市建设。其中基础设施编，分章记述了城镇设施、交通设施、邮政电信；城乡建设编，分章记述了村镇建设、绿化管理、市容环卫、综合执法、建设管理等内容，使城市建设的内容更加全面、丰富。

城市辖区内的单位，有区属单位、市属单位，可能还会有省属和中央单位。根据《地方志工作条例》要求，无论什么隶属关系，只要在辖区内都应该记述。《西青区志》在记述中，不仅记述区属单位，也记述了驻区单位；不仅记述区属企业，也记述了国美、物美连锁超市等驻区企业；在记述学校时，不仅记述区属学校，也记述了驻区高校等，符合《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要求，同时也保持了辖区内各项事物的完整性。

城市区志还要处理好“条条”与“块块”的关系。城市是一个整体，城市规划、城市管理、城市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都要按照城市性质和功能统一考虑。城市辖区是城市的一部分，在记述辖区内城市建设中，许多方面很难独立记述，导致一些城市辖区志书内

容的缺失。加上城市管理中一些体制性问题，有些方面的管理体制并不是按照行政辖区来设置，这就给城市区志编修带来困惑和难度。比如，城市区志中要记述供电、供气、供水、民航、铁路、邮政、电信等内容，而这些行业主管部门并不是按城市辖区设置，更多是“条条”管理的。如果区志不记，则会造成资料的缺失，影响城市功能记述的完整性，如果记述，怎么记、如何记。《西青区志》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比较完整地记述这方面的内容，并没有以行政隶属关系为由不记这部分工作，从而避免记述内容的缺失。

作为一部城市区志，《西青区志》不仅在内容记述上以“西青异彩”开篇，秉承详近略远的记述原则，很好地处理了与首轮区志在内容上的交叉与衔接问题，资料翔实，据以实录，是一部认识西青、了解西青、研究西青的百科全书。值得一提的是，志书分上下两册，装帧大气精美，版式设计新颖别致，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达到了志书专业特色与地域特色的完美统一。同时，封底作开槽设计，附全文光盘，实现了文献资料的数字化存储，也便于区志传播和电子化阅读。

总之，《西青区志》是一部特色、特征、特点都十分突出的志书，为确保志书质量奠定了好的基础。当然这部志书编纂时间比较仓促，难免出现一些问题，但瑕不掩瑜。本轮《西青区志》的编修，为全国方志界如何更好地编纂城市区志起到借鉴和促进作用，我们也期待在第三轮修志中，看到质量更好，特色更加突出的《西青区志》。

(供稿单位：西青区地方志办)

中国名镇名村志文化工程申报流程解析

韦 恬

2015年，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相继启动（以下简称“两名”工程）。“两名”工程是响应党中央号召，继承传统文化精华，挖掘历史智慧，为助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贡献地方志力量的重要举措。自该工程启动以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地方志办）主动作为，对全市各区镇、村情况进行全面摸底调研，选取重点镇、村组织推动。各区地方志办火速响应，充分挖掘区域特色亮点，积极申报。首批出版的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丛书共11部，天津市北辰区《天穆镇志》成功入选。首批出版的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丛书共27部，天津市北辰区《双街村志》、西青区《王兰庄村志》《凌庄子村志》成功入选，并拍摄了名村影像志在中央电视台播放。随后，西青区《杨柳青镇志》、津南区《咸水沽镇志》也成功入选第六批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丛书，西青区《精武镇志》《王顶堤村志》、静海区《团泊镇志》已进入稿件审修流程，可谓成果显著。2022年上半年，武清区河西务镇，西青区张家窝镇、白滩寺村、付村也一直在积极申报，其中，河西务镇已通过中指办申报审核。全市申报“两名”工程的热度持续升高。

笔者一直负责全市名镇名村志工程的申报、审核工作。在申报工作中，各单位对于申

报流程和具体细节存在疑问较多，遂将历年申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中指办最新申报要求进行了汇总分析，以期提高各单位申报效率，有效推动我市“两名”工程申报工作的开展。

一、精选申报单位，明确入选资格

作为国家级的文化工程，中国名镇志和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都有特定的“门槛”。根据《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实施方案（2022年修订）》，名镇志入选范围包括：“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全国重点镇”“全国文明镇”“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镇”“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国家级生态镇”等。作为某种文化、习俗发源地或传承地的镇，可酌情收录。根据《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实施方案（2022年修订）》，名村志入选范围包括：“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国家森林乡村”等。作为某种文化、习俗发源地或传承地的村，可酌情收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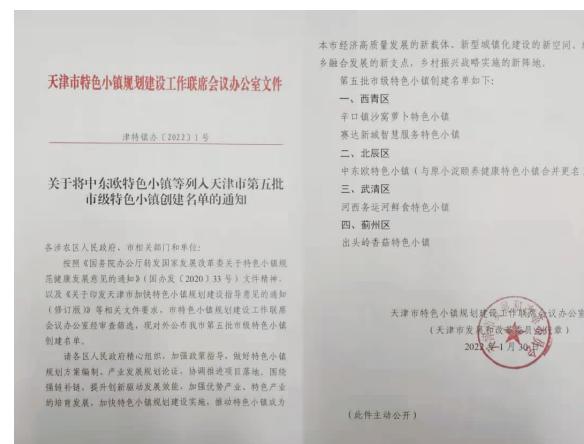
在初筛入选资格工作中，必须从两方面进行考量。一方面是获得过方案中已明确的国家级荣誉镇村。如曾获“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荣誉的西青区杨柳青镇、蓟州区渔阳镇西

井峪村。获得过“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荣誉的北辰区青光镇韩家墅村、武清区河北屯镇李大人庄村、宝坻区黄庄镇小辛码头村。“国家级生态乡镇”:东丽区华明街、滨海新区茶淀镇。“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西青区杨柳青镇、北辰区天穆镇。“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津南区小站镇迎新村、宝坻区黄庄镇。“全国文明村镇”:西青区精武镇付村、静海区双塘镇西双塘村等。另一方面,按照方案规定,编纂“名志”系列志书所需编纂经费大部分需由承编单位承担,镇村是否具有积极主动的申报意愿并能提供编纂所需的人力、财力支持也是推荐申报工作中的必要考量因素。

二、精准选择类别,丰富佐证材料

申报工作的第一个环节是提交申报镇村所获荣誉的佐证材料报市地方志办审核。申报单位应根据自身实际准确选择申报类别。以天津市已出版的名镇村志为例,《天穆镇志》突出的是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民族文化特色与全国文明村镇的管理成效。《双街村志》突出的是现代都市休闲农业和村办工业的发展。《王兰庄

村志》突出的是天津市南部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诞生地和新农村建设的典范。《凌庄子村志》突出的是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和城中村由“乱”到“治”的管理经验。从去掉一般化、突出个性化角度选择申报方向,是成功申报名志工程的第一步。佐证材料以国家级荣誉为首选,市级荣誉为辅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类:一是所获荣誉的奖状、证书、牌匾;二是资格认证的相关文件图照;三是石碑等实物佐证材料。



佐证材料示例 2 文件: 2022 年 1 月, 河西务镇被列入天津市第五批市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
(津特镇办 [2022] 1 号)



佐证材料示例 1 荣誉牌匾: 王兰庄村获全国优秀小康村荣誉 (西青区王兰庄村申报材料)



佐证材料示例 3 石碑: 2013 年 3 月, 大运河被评为第七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十四仓遗址)
(武清区河西务镇申报材料)

三、精心撰写简介，突出亮点特色

在撰写申报简介时，应着重突出符合申报类型的地域亮点和特色，一般化的工作不写入。以下将同为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志书的简介节选，作一对比。

简介一节选：**镇，为天津市**区第一大镇。历史积淀深厚，地理位置优越，物产资源丰富，该镇域内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4处，曾出土战国时期文物，陶釜、陶片、纺轮、板瓦等。进入新时代以来，各项工作均取得卓越成效。2001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全国信访工作先进集体、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先进单位。2002年，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年度信访工作先进集体、支援抗洪救灾工作先进集体、天津市关心下一代先进集体……进入新时代以来，全镇开展环境生态整治、服务民计民生、大力做好扶贫工作，镇内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逐渐走向振兴。

简介二节选：河西务镇地处大运河畔，属天津市武清区，素有“京东第一镇”“津门首驿”之称。历史积淀厚重，起源于汉代，古称瀛西。唐代改称河西镇，元初得名河西务，元明清三朝都在此设官置府。文物古迹遍布，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处，即大运河与十四仓遗址。紫竹禅林寺为天津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另有未定级文物保护单位25处。发展频创佳绩，村镇单位先后获国家级荣誉51项，市级荣誉189项……近年来，河西务镇以创建运河鲜食特色小镇为契机，着力打造历史文化名片。十四仓遗址公园、白河书院与河西驿仿古创意街区、民俗美食街等项目顺利推进，千年古镇再度成为京津城郊最具发展潜力和活力的地区之一。

两段简介对比，显然河西务镇的简介更紧

贴申报主题，详略得当，既突出了申报方向的地域特色，又体现了近年的发展趋势。而第一段简介，虽然也罗列了所获的众多荣誉，但多是镇政府开展行政工作所获的政绩，与申报方向关系不大。

四、精细工作流程，规范填写申报

名镇志由镇政府组织申报，填写《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申报表》，并附镇志篇目、镇情简介。名村志由所在区地方志办组织申报，填写《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申报表》，并附村志篇目、村情简介。经区地方志办推荐并审核、市地方志办复核，由市地方志办上报丛书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评审。申报单位将申报表填写完毕并盖章后，将电子版申报表及纸质版申报表（一式四份）报市地方志办。

以下附名镇志申报表填写示例（名村志申报单位为区地方志办或村志编纂委员会）：（见附件1）

五、精炼申报篇目，规避常见问题

志书篇目是集中体现申报村镇发展全貌的主要线索，质量的高低也是申报能否通过的主要影响因素。除了按照方案要求突出地域特色以外，还有一些常见问题应注意规避，以提高篇目质量。

（一）过于追求门类齐全

普通镇村志要求篇目体现地域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历程，而名镇村志不要求面面俱到，如群团工作、财税金融（以此类工作为特色的镇村除外）等特色不突出、不鲜明的一般性内容可略去不记。

（二）大事纪略太过琐碎

申报单位首次提交的篇目中，大事纪略大多是站在本镇本村的角度罗列“大事”，如统

附件1

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申报表

名称 XX 镇志
编纂单位 天津市XX区XX镇人民政府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印制

志名	XX镇志			
编纂单位情况	编纂单位	<u>天津市XX区XX镇人民政府</u>		
	负责人	<u>镇政府此项工作负责人</u>	职务	
	联系人	<u>志书主编</u>	职务	
	联系电话		邮箱	
	联系地址			
国家荣誉	1. 荣奖时间+荣誉称号 2. 荣奖时间+荣誉称号			
	内容包括: 1. 镇基本情况 2. 近五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突出申报特色。			
镇政府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月日			
县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意见	(盖章) 年月日			
地市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意见	(盖章) 年月日			
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意见	(盖章) 年月日			
中国名镇志丛书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意见	(盖章) 年月日			

一修缮了村内果园，新建学校校舍等。但编修方案中对大事纪略的要求是：立足全国，选取对本地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数量原则上不超过10条。这就要求主编站在全国读者的角度，选取村镇大事：如镇、村建立，对区域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次”，获得国家级荣誉，全国著名品牌的创始等。

(三) 附录忽略新旧方案的区别

旧方案中的附录收录内容包括：原始文件、新闻报道、重要表录。而新方案中的附录只有文献辑录和艺文目录。旧方案中附录外的“艺文”部分在新方案中已取消，以附录中的“艺文目录”代替，并特别注明“不收录原文”。这一改变是对前期名志稿件中出现的本地文献过多、编者的选取标准过于随意的一次修正，提示主编在谋划篇目和选择内容时要特别注意精简本地文献的选取。对歌咏本地的代表性文献认为特别有收录必要的，全文可收录在“文献辑录”中，但必须达到在省级或国家

级刊物公开发表的标准。

所有申报材料经市地方志办审核后上报丛书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评审。评审通过后，中指办将在申报表原件上盖章返还申报单位，以示申报成功，可以开始志稿编纂工作。

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自启动后获得了良好反响。天津的入选志书出版后也都在乡镇文化振兴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志书记录了先辈的奋斗历程，是传承红色基因的新阵地；志书记载了镇村中的好人好事，是树立先进典型的光荣榜；志书分发给镇村居民，是培育文明乡风的传家宝；志书介绍了镇村的特色亮点，是提升品牌效应的宣传名片。希望全市具备申报基础的乡镇都积极参与到中国名镇名村志系列文化工程申报工作中来，充分利用好国家级文化平台，发挥“志”力优势，以名镇村“志”助力天津镇村之“治”。

(作者单位：市档案馆方志指导部)

由康熙版《静海县志》探究静海先贤于道行

李佳阳

于氏家族乃静海名门望族，诗书传家，广施好义。当官者廉洁清正，堪称循吏；为民者乐义好施，德馨乡里。

据《于氏族谱》记载，静海于氏原为山东文登县大水波乡望族。明朝初，于国义与其兄国仁同迁直隶永清信安镇，农耕为生，渐致富发家。明永乐二年（1404）诏郡邑拨户口充畿辅，于国义以“大丈夫何地不可以托业”的胸怀，留兄国仁占籍永清，而自己独自应诏迁来静海，占籍辛口里七甲，民籍。初居县治北阁街（今静海镇二街），仍以农耕为生。由于他善于经

营策划，种植丰收，畜牧业兴旺，家境更为富饶，并建有别业，名曰“陶居”。他常常教育子孙以忠厚相勖，以耕读共勉。他说：“子孙虽愚鲁，经书不可不读，能成立则出仕为忠良，不能成立则务农守淳朴，此经久继世之法，子孙共勉之。”

自始迁祖于国义传四世为于俊、于鉴、于铣、于杰，分作伯、仲、叔、季四门。目前已经传至二十四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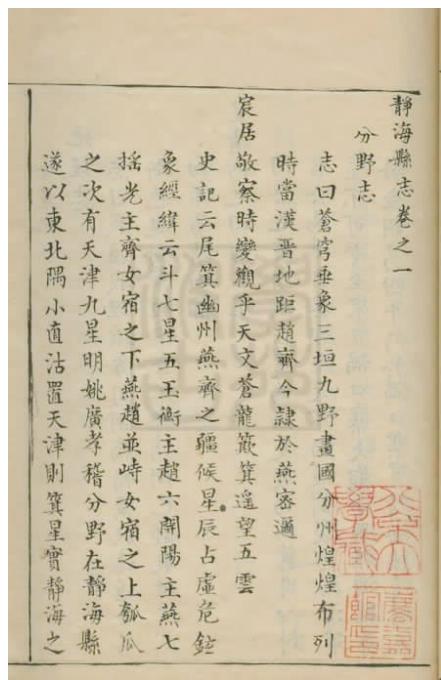
一、发现于道行始末

笔者对静海志书的研究曾整理成小文《静海的明代方志》，发表于2017年3月13日的《今晚报》副刊津沽版。文章考证出明代除天启版《静海县志》外还有三部静海志书，分别是明初版的《静海县图志》《静海县志》及万历年版的《静海县事迹》，这样已知明代静海志书就达到了四部。虽然全部佚失，但让后人知道曾经修撰过这些志书，可喜的是还发现了一篇天启版《静海县志》的跋文，由静海先贤高爾俨所撰。

清代纂修静海县志共两部，分别是康熙版和同治版，现存康熙版县志由于刻板及印刷问题，县志文字多有漫漶，极不清楚，影响阅读，因此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和利用。目前县志编修部门及域外研究机构凡涉及静海内容的均引用同治版县志或民国版《静海县志》，但同治版县志对清前期及明代静海历史的记载不是很详



南开大学藏《于氏族谱》



手抄本康熙版《静海县志》书影

细，所以康熙版县志的价值凸显出来，几代静海文史人都想把它点校整理出来，但苦于版本缺字严重，都未完成，成为静海文史的一大遗憾。通过不懈搜寻得到一条线索，在一家公藏机构藏有一部手抄本康熙版《静海县志》，经多方努力，虽未得到扫描本，但将流传本中的缺字全部补充完整，并点校完成。在整理过程中发现在卷二《选举志》中，岁贡一栏明代有“于道行”者，名下小字介绍：“任山东滕县训导，升山西应州学正。居官清苦，事亲孝谨，抚孤侄如己子。好学至老不倦。欲修县志，有遗稿未就而卒。”说明在明朝，静海先贤于道行曾纂修过静海县志，并留有县志稿，可惜未最终完成出版便去世了。至此静海明代志书又多了一部，虽然只是一部志稿，也是非常珍贵的。

二、明代县志稿修撰者于道行

这部县志稿早已佚失，要想更多了解这部县志稿，可以从解读修撰者于道行开始。第一

个解决的问题是这个“行”字，是读 háng 还是 xíng。笔者趋向于读 xíng，如果读 háng 的话，读白了成了 dào·heng，解释成了僧道修行的功夫。读 xíng 的话，“道行”还可以解释为在宽广的道路上行走。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怎么读都可以。

首先从他的任职地查起。县志记载任职滕县训导、应州学正，查阅康熙版《滕县志》，在卷一《职官志》训导栏中嘉靖时期有于道行的记载，“于道行，静海县人，恂恂有体”。但没有记载他的任职时间，于是查询更早的版本，再查阅藏于海外的明万历版《滕县志》，仔细查阅后，很遗憾没有发现更多的信息。再一个任职地是山西省应州，查询乾隆及光绪版的《应州志》均没有记载明代学正。是否被遗落了？转而寻找更早的版本，找到万历版《应州志》，其中卷四《官师志》载，应州设知州一员，儒学学正一员，训导三员。但只录入了知州名录，学正及训导名录未收录。到此这两个任职地的地方志没有发现太多关于他的有效信息，犹如陷入了僵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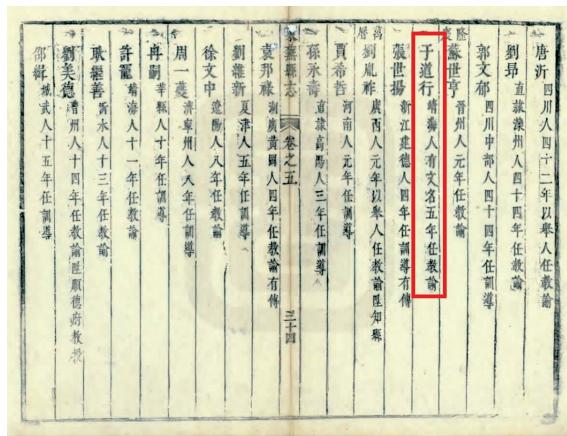
通过大数据搜索发现于道行还在一地任过职，就是山东莱芜县，查阅民国《续修莱芜县志》卷十六载，于道行明隆庆五年（1571）任莱芜县教谕，他的下一任是万历元年（1573）到任，这样算他应该在莱芜县工作两年。

查阅卷三十四《传序表志》发现收录有他的一篇文章《吕母魏氏贞洁文》，卷三十五《艺文志·碑记》收录有他的一篇文章《学田记》。这两篇文章的发现出乎意料，因为在有记录的任职地，滕县和应州的地方志都没有发现更多信息，而在被忽略的任职地的地方志发现了这么多的信息。但其中《学田记》缺字严重，共缺 100 字。推测本文是从石碑上抄写下来的，因石碑年久碑文漫漶，部分文字无法识别。



民国版《续修莱芜县志》中缺字版《学田记》

想要找到更多信息，必须找到更早的县志版本，查询到康熙版《莱芜县志》卷五载：“于道行，靖海人，有文名，五年任教谕。”果然越接近人物时代的志书信息越全，静海原名靖海，明初改靖为静，始称静海，所以这里称靖海人也对但也不对，阅读全国其他地方志，也发现有将静海人写成靖海人的情况。后面的“有文名”，这是光绪志没有的内容，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字，但说明他学识渊博，文采出众，得到了学子及官方的认可。在本志卷八又发现了一篇他的文章《孺人吴氏贞洁碑》。在惜字如金的志书中共选录了于道行三篇文章，也说明了康熙志对他的评价“有文名”名副其实。



康熙版《莱芜县志》于道行记载

对一位古人的介绍，家谱应该是最详细的。查阅静海《于氏族谱》，于道行是静海于氏第七世，“字文焕，号霄厓，明嘉靖庚申（嘉靖三十九年）岁贡士，任山东滕县训导，升授山西应州学正，居官清苦，事亲孝谨，抚孤侄如己子，好学至老不倦，欲修县邑志，有遗稿未就而卒，俱载邑乘。始创序家谱，至今得以追叙者，皆赖有遗本。娶孟氏，继刘氏、李氏。生男四：野、壘、增、垣”。家谱的这段记载信息量很大，知道了他的字号和取得岁贡生的时间，任职地及官职和县志记载一致，对他为官和为人的高度评价，还有他的一些事迹，抚养侄子如自己儿子一般；修纂县志，留下遗稿；创修家谱，为后世留下资料，以便续修。他有三任妻子，四个儿子，每个儿子的名中都含有一个“土”字，应该是有所寓意。可惜的是，没有记载他的生卒年月，无法完善他的履历，理清生平，只能继续查阅家谱，根据他直系或者旁系亲属的生卒年进行推断。

子長瑞	子琥	子次珠	子長珠	子璣
道行	道充	道生	道臻	
字文焕號霄厓明嘉靖庚申歲貢士任山東滕縣訓導	字文璇號林泉明邑庠生	字文輝號望泉	字文至號崖叟	
山西應州學正居官清苦事親孝謹撫孤姪如己子好學	山西應州學正居官清苦事親孝謹撫孤姪如己子好學	山西應州學正居官清苦事親孝謹撫孤姪如己子好學	山西應州學正居官清苦事親孝謹撫孤姪如己子好學	
娶孟氏	娶劉氏	娶周氏	娶李氏	娶李氏
生男一里莊	生男二廷芝	生男三廷蘭	生男四臺	生男五壘
娶李氏	娶劉氏	娶周氏	娶焦氏	娶周氏
生男六趙氏	娶李氏	娶周氏	娶焦氏	娶周氏
娶周氏	娶李氏	娶周氏	娶焦氏	娶周氏
娶周氏	娶李氏	娶周氏	娶焦氏	娶周氏

《于氏族谱》于道行内容



于道行之父于珣，字美玲，号崑岗。明处士，敦行尚义，无少长皆敬仰其高致。（处士：本指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后亦泛指未做过官的士人。高致：崇高的人品或情趣。）同样也没有记载生卒年，但是于珣的崇高人品一定对于道行有所影响，导致于道行后来创修家谱，义修县志的这些壮举。于道行长子于野，字子先，号行吾，明邑庠生。次子于壘，字子魁，号仰吾，明邑庠生，嘉靖癸丑年（1553）生，万历辛丑年（1601）卒，高年四十有九。三子于增，字子益，号任吾，明万历戊子科、辛卯科、庚子科三中乡榜武举载邑志。四子于垣，字子逸，号居吾。

以上是于道行的直系亲属关系，通过梳理得到三个准确的时间节点。1.于道行次子于壘的生年是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2.于道行考取岁贡生的时间是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3.于道行在明隆庆五年（1571）任莱芜县教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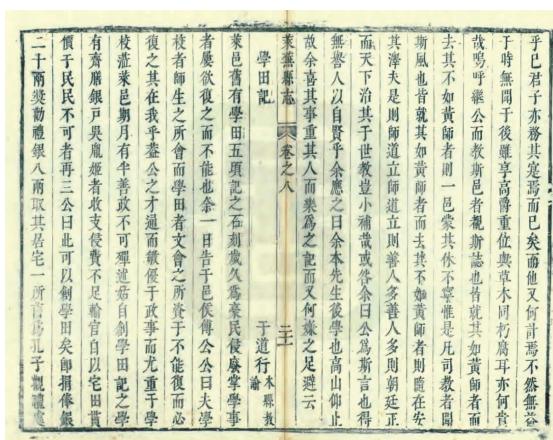
于道行创修《于氏族谱》传承优秀家风，修纂《静海县志》积攒旷世阴德。福荫子孙，耕读传家。于道行后世子孙秉承家学，不辱家风，庠生、廪生、贡生比比皆是，武举人1人，文举人2人，进士3人，皆出自他的直系后代。

三、于道行文章三篇

第一篇是收录于康熙版及光绪版《莱芜县志》的《学田记》，本文曾被刻石为碑，推测立于莱芜县垂杨书院。据传2000多年前，孔子曾经在莱芜口镇街道垂杨村观礼，450年前，明代莱芜知县傅国璧在孔子观礼处建立了观礼书院，命名为垂杨书院。本文就是记载了成立垂杨书院的过程。后来书院慢慢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可喜的是垂杨书院得到了重建，坐落在济南市舜耕路219号，2016年3月由文化学者张

期鹏等几位莱芜老乡共同发起成立，是一个集藏书、研究、交流、讲学于一体的民间公益文化机构。下面我们来阅读这段历史，欣赏于道行的文采。

莱邑旧有学田五顷，记之石刻，岁久为豪民侵废，掌学事者屡欲复之而不能也。余一日告于邑侯傅公，公曰：夫学校者，师生之所会，而学田者，文会之所资。于不能复而必复之，其在我乎？盖公之才通而敏，优于政事，而尤重于学校。蒞莱邑期月有半，善政不可殚述，姑自创学田记之。学有齐膳银户吴胤姬者，收支侵费，不足输官，自以宅田貫价于民，民不可者再三。公曰：此可以创学田矣。即捐俸银二十两，奖劝礼银八两，取其居宅一所，旧为孔子观礼处，更新之，立为垂杨书院取其周围地共一十三亩四分四厘五毫，立为学田，故牒本学收掌。会□□□民赵盈、刘贤浸种临河淤地共二十九亩六分，许告入官。公曰：亭固以类而聚，此亦可以补学田矣。再牒本学收掌，二项共得地四十三亩四厘五毫，书院草瓦屋间数，门窗墙垣，地基长阔丈尺，无租，开过矣。胤姬田租数目具备，故牒卷案稽考，此特造其端耳。若夫润泽增益，实有望焉。由是田之所



康熙版《莱芜县志》于道行文章

出，为师者勿以入私橐，勿以需燕会。生之贫者，昏不能娶也，丧葬不能举也，流离而不能还定安集也，出纳而济助之，则师生文会之所资，非徒所以为养，其所以为教者亦多矣。夫公议修学宫，业已处银八十六两有奇，谷三百石，贮之学库、学仓，以待用有日矣。更创置学田若此，其树功于学校何如耶？是用□□□公名国璧，号玉吾，江西临川人，领丁卯乡荐，由署太湖教谕升莱邑侯云。

第二篇文章是收录于康熙版《莱芜县志》的《孺人吴氏贞洁碑》。

孺人吴氏，归王君讳强，自幼慈惠贞静，善事翁姑，乡人义之。翁姑既死之后，不幸夫早逝，孺人哀毁不自禁，即欲以身殉。诸姊婉言慰之曰：汝夫既已矣，一孤尚幼，汝即欲从汝意，亦非汝夫所愿也。孺人乃大感悟，而遂不果。是时孺人方二十五岁，子志贤九岁，子母孤孀，况家无余赀，时势艰苦，久而姻亲怜之，欲夺其志。孺人即以死自誓，坚持不二其心，躬亲纺绩，抚养孤幼。且性质清淑，寡言笑，尚朴素，衣食粗粝，冰霜节操，六十余年如一日。子志贤，诚寔忠厚，感激至节，克敦孝道，乡士大夫重之，荐于县尹。县尹荐于督宪，重加奖令，令县尹陈公携礼帛诣其门，表其庐曰“柏舟遗烈”。

第三篇文章是收录于康熙版及光绪版《莱芜县志》的《吕母魏氏贞洁文》。

夫人之所以立身于天地间者，惟其节焉耳矣。大哉节乎！天之道也，地之理也，人得之以检制其行者也。士君子百行一亏，其节，尚不得为完德；妇人从一而终，必贞于其节，然后可以语贤妇矣。是节也者，士君子之所难，而妇人尤为不易者。兹有吕母魏氏，贞于其节焉，不亦难得也哉！母东廂保者，老魏昭女也，

适吕凡七年，夫时景亡，遗二子，长三岁，次甫五月，母慷慨自缢以殉。会同室者觉而救解之，且劝曰：汝死诚是矣，奈二子何？相将以成人，不犹愈于死乎？氏仰天自誓，命其长子曰尚操，次子曰尚志，所以坚其节也。自后家无厚产，凶荒荐至，食不充口，体无完衣。尚操早殇，尚志十余岁，时或行佣供母，母志操愈坚。贤士大夫过其门者，莫不叹服。虽走卒里妇，亦知慕其行谊。呜呼！母不轻于一死，而竟成尚志行佣之孝，非天之所以厚报母乎？夫不幸早亡，有妻以完节成立，其子终契阔于壤泉，夫虽死犹生也。七年刑于之化，又有以锡其夫之光，母诚贤乎哉！母女流也，未尝学问，天植其性，自及笄以至垂白，孝舅姑，睦妯娌，顺夫教子，植立纲常，扶持世教，与今古之忠臣义士、孝子顺孙，辉映于宇宙间焉。猗与休哉！是故乡里敬之，官府奖之。余亦倘述之，以为异日作史者之实录云。

明代《静海县志稿》修纂于万历年间，修纂者于道行，出身于书香门第、文化世家的静海于氏家族。于道行字文焕，号霄厓，约出生于明嘉靖初年，嘉靖三十九年（1560）取岁贡士，初任山东滕县训导，隆庆五年（1571）调任莱芜县教谕，万历初年升山西应州学正，居官清苦，有政声，事亲孝谨，抚孤侄如己子，好学至老不倦。致仕还家后，教子弄孙，心怀桑梓，留史后人，搜集采访，不辞辛苦，潜心修纂县志，惜未就而卒，留下《静海县志稿》，或许被后世修志者借鉴，部分史料才能传承至今。于家乡历史，纂修县志，于家族历史，创修家谱。传承文化，堪称静海先贤，受后世敬仰。逝后葬于东窑村后的于氏先茔。

（作者单位：静海区西塘庄园文化大院）



陈骥于北洋大学初创之贡献

张金声

北洋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化的大学，诞生于天津。囿于资料匮乏，其初创之成因，说法各有不同。近年来，随着相关档案的不断公开，为研究北洋大学的初创成因提供了多角度的视野。本文据相关资料，旨在说明其初创之际幕后人物陈骥做出的贡献。

陈骥建议创办大学

清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即公元1895年10月2日，光绪帝批复直隶总督王文韶所奏《津海关道盛宣怀倡捐集资创办西学学堂请饬立案折》并下所司所知之。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晚年自号止叟。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今常州市）人。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天津大学的创办者。

盛氏早年为筹建图书馆筹划购书，给其在日本好友赵凤昌的信中写道：

近日常赴公园各图书馆博览群籍，华洋今古，无所不有。慨于吾国数千年名哲精英沦落于外人之手，一去不返，尤非金融财产可比。公襟怀夐远，若到此一览，当无不喟然长叹也。

弟前因上海各国聚处，可以持久不变，特建图书馆一以便士林。闻南中旧家藏书迫于乱离，倾筐而出，若能趁此时广为搜罗，未始

不果为东南保全国粹。公谅有同心，兹先措上日金二万元，交妥便带沪，到日即请查收，代为留意收买。俟奉覆翰，再当设法统筹，节无用为有用，总共拟以四万元为度。专购未见之书，从容分办，不必亟亟。他日馆成归国时，必当与公面商布置。盖治国之本，在正人心。

昔年南洋公学学生，必欲以国文为根基。目下判经离道，似须仍从根本上着力。人心一正，则安内攘外，无事不可为矣。质之高明，不以为迂否？^[1]

盛氏与赵氏有同乡之谊，且为好友。

赵凤昌（1856—1938），字竹君，号惜阴。武进县（今常州市）人。光绪十年（1884），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幕中侍从。不久，因办事机灵、勤快，被张之洞赏识，拨充总文案参与机要。光绪十五年，随张之洞到武昌，继擢总文案，深得张之洞信赖。

清光绪十五年（1889）八月，张之洞甫任湖广总督便决定将原准备在广东兴建的炼铁厂迁至湖北。适逢盛宣怀以事谒张氏，言及炼钢之事，张氏提到尚无铁矿，盛氏当即表示愿将原在大冶购得之铁山矿交给张氏开办。年底，盛氏又和张氏面谈开办铁矿事宜，并提出四条有益建议，为张氏出谋划策。张氏遂兴建汉阳钢铁厂，开办大冶铁矿。于是，大冶铁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用机器开采的大型矿山。

[1] 《赵凤昌藏札》第45册，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

张氏与盛氏的洽谈并成功，赵氏功莫大焉。二人从此订交，盛氏知赵氏受张之洞信任，故许多难办之事愿与之一吐为快，并争取赵氏的帮助。

从此信中可知，盛氏有志于文化教育事业，这与其后来提出创办北洋大学是一脉相承的。

盛氏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的教育思想和学校体制逐步传入中国，为我国近代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同时，大量的西方教育图书也传入中国，如《德国学校论略》《西学考略》等，对多国学校教育制度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并将西方的教育制度、教学管理体制、教学内容等教育模式展现在国人面前。

清光绪十八年（1892），盛氏任直隶津海关道兼直隶津海关监督。

甲午战争与日作战的北洋水师及淮军，皆归李鸿章调遣，故而战略谋划、军队调派、后勤供济，绝大部分在天津进行。

甲午战争失败，继而签订《马关条约》，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分崩离析，在西方列强炮火中产生的资本主义也难挽狂飙，中国陷入民穷财尽、国库空虚之中，培养新型人才以图富国兴邦成为迫在眉睫的选择。

然而，盛氏毕竟是以经营实业为主，如何将旧式的书院教育模式改变为近代教育的西式学堂，盛氏苦苦思考，然而不得其要领。此时，他的同僚兼挚友陈襄提出创立北洋大学堂。

陈襄，字子腾，号石麟。直隶天津人。光绪十五年中举，二十四年戊戌科二甲进士，散

馆授编修。光绪三十四年任贵州提学使，次年署贵州布政使。

陈氏刻苦好学，天资聪敏，加之留心时局，其在北洋当差期间，多有新政建议。

陈襄在《致鹿蘋贤侄阁下函》中写道：

设立书院一事，数日前谒盛杏翁，据云库帑支绌异常，筹款甚艰，惟拟于现在书院添格致课，以课西学，开风气可也。答云：仅开考证课，终属空谈，似不如延教育学专门，方为实用。杏翁又云：拟立小学堂，取十数岁童生，自中学《四书》《左传》《书经》读起，分课洋文洋语及公示约章等类。因命鄙人取《四书》白文注浅说，以便童蒙；并命鄙人充汉教习，鄙人当即遵命谢出。唯《四书》浅注，尚未动笔，学堂亦未知何时创立耳。稍暇即擬动笔。再谒杏翁商谈如何办法也。^[1]

此信是陈氏写给沈鹿苹的。

沈恩嘉，字鹿苹，直隶天津府人。官军机章京近二十年，一度揆领章京，熟悉清廷典章制度，性敏练，慷慨敢任事。

陈、沈二氏同乡且有世谊。沈氏官职不高，却与上层关系密切。甲午战中其极力主战，战后痛定思痛，主张改革。

从陈氏致沈氏信中，可以窥见其不满足于盛氏所要创立的小学堂，其欲通过与沈氏沟通，并希望得到他的帮助。

陈氏此信，只是提出“惟拟于现在书院添格致课，以课西学，开风气可也”的书院。此后不久，陈氏又致函沈氏：

时事多艰，尚望格外珍摄，以肩重任。吾

[1] 《致鹿蘋贤侄阁下函》未刊本，《澳门理工学报》，2016年第1期，第117页。



津诸前辈，可与谈时务者甚罕。复安望为国家设一富强之计，桑梓所仰望者，惟有阁下一人，所冀早日得君一为振兴耳。

前闻外洋《新报》有言：俄国借东三省之地修造铁路，直至营口，未知确否？果尔则其祸更将甚于日本。窃以今日竭力自强，已落人后，而犹幸地大物博，人才众多，果能实事求是，经营十五年，尚可争衡于西国。第一变通学校以育人材，务使学其所用，用其所学，专立教育部总持其事，不使固执浅陋之地方官阴挠之。则学堂六年，足可办理利国利民之事。学至十年，足可自出新义，争胜泰西。但非圣君贤相，毅然改图，虽有草茅一手一足之烈，终无补于时局。

鄙人前拟请建书院，禀稿缮清后，由钟君鹤笙转呈盛杏翁观察。观察深以为然，而微与钟君意见不同。钟君以考课优奖，借开翰詹科道之风气，意在挽回积弊，收效稍速。

鄙人及诸同仁之意，在实事求是，可言即可行，收效较迟，故斟酌两端，莫衷一是。兹将钟君前向合肥（李鸿章）所上禀稿，合肥未答，及敝同仁公拟禀稿，一并呈阅，尚祈一决，以定从违。^[1]

由是信的此段可以看出，陈氏与钟君所拟创办新式学堂条文，盛氏略微与钟君有不同，但大体是赞同的，上禀李鸿章后并未得到其回复，故而陈氏求教于沈氏。

考李鸿章未回复，盖事出有因。一是甲午战令李鸿章焦头烂额，前途未卜；一是十数年前，其与曾国藩送留美幼童，中途而返，其回国后大多人来到北洋。若开办西式学堂恐非李

氏力所能及？

在此信中，也可见到陈氏提出“实事求是”的办学方针，这应是北洋大学校训的滥觞。

信中提及的钟君，即钟天纬（1840—1900），字鹤笙，上海金山亭林镇人。清同治十一年（1872）入上海广方言馆攻读英语，为该校第一期学生，光绪元年（1875），应徐建寅之邀，赴山东机器局翻译馆任职。光绪五年，受清政府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邀请游历欧洲各国，考察政治、文化和经济状况，比较西方文化与中国政俗之短长。光绪七年回国，受聘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除与英国人罗亨利、傅兰雅合译《西国近事类编》《工程致富》《英美水师表》《铸钱说略》《考工纪要》等书籍外，根据游历考察所得，撰写《格致说》《格致之学中西异同论》《西学古今辩》《中西学术源流论》等篇文章，专门探讨中西文化的差异和优劣。光绪十三年，应盛宣怀之邀赴山东烟台，分析上海轮船、电报两局之利弊，颇得重视。

他同情民间疾苦，主张减免税租，倡议修筑铁路，呼吁收回民族工商权利。在政治上赞成改良，与变法维新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交往甚密，并为汪康年主办的《时务报》撰稿。光绪十九年，在上海格致书院创设兴学会，并募集经费在高昌乡开设“棠荫”“董威”“湖海”“平安”四所新式小学，自编教材12册，名为《读书乐》。后又重入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专心著译。

在比较文化方面，他研究较早、范围较广，有很多新颖中肯之见，对广义文化中的哲学、科技、风俗、教育乃至民族习性等都进行了比

[1] 《致鹿蘋贤侄阁下函》未刊本，《澳门理工学报》，2016年第1期，第119页。

较考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批评，同时肯定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发展史上的地位。他的《中西格致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别》《中西民好静与好动之分》《中西学术传统重道轻艺与轻道重艺之殊》等文中的观点，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很大影响。此外，他警惕列强的侵略野心，为加强国防出谋划策，除大量译作外，还著有《别足集》《格致课存》《随轺载笔》《佐幕刍言》《时事刍议》《扪虱录》等书。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因中风去世。

紧接着，陈氏话锋一转，写道：

敝稿计分六门，政治为立国之本，故以为首。商务为富民之本，民富斯国富，故次之。格致为致富强之实功，又次之。明格致而后能制造，故又次之。而政治、商务、格致、制造，有非图不明者，故又次以测绘，以上各事皆取人之长，救吾之短，上海所译各书，未能详尽，故译书为要。中国既与泰西交涉，必须知己知彼，而后操纵可以由我，故译报又次之。以上六门，各有细目，原拟每目各系一说，以卧病十余日，仅拟数条附呈。

查阅数日前，闻盛观察创立洋酒公司，禀王制军（王文韶）入奏，准予卅年专利。此风一开，庶中国制造可以踊跃。数日晤院房友人云：王制军公事认真，才具较逊合肥，而待人谦和，不似合肥专喜谗谄面谀之辈。以此卜之，将来认真收罗人才，未始非北洋之福。藩司陈君（陈宝箴），闻候补友人云：人甚方正，微与合肥不洽，倘能久畀以权，直省吏治必可蒸蒸日上。

月前友人金巨卿由关外来津销差，云：前在关外以西医治受伤兵弁，各营之弊，一在不能战，一在不战。李光九以五营之众，阵亡殆



尽。而大弊又在兵数不实，所统卅营者，至多不过二十营之数，其余可类推。

刻下虽已平安，而练兵断不可缓。天津武备学堂，颇有人才。广东水陆师学堂，亦有人才。去冬闻河东刘春圃之侄，由广东学堂来津，现为汉纳根约去，代为操兵。闻刘君之学在汉纳根以上。缘汉纳根所能者，德国之老操，刘君所能者，德国之新操也。

各路统兵大员，似宜访用此等人才，以收实效。

又闻无稽之谈，云：张香帅（张之洞）硬捐安徽诸富绅以造铁路，但此事不必有，而此论则甚快。当此时艰孔亟必不肯轻出资财，以利公家。当轴者非用霸术，如香帅，亦断难集事。

窃意直省磁州、河南武安，连境铁矿，煤田亦富，绵恒不绝。如仿张湘帅之说，集资开矿，制造枪炮铁路，三年必当获效，十年则北洋可以自强。直省富户不少，惜无香帅耳。

闻香帅今春约英人李提摩太咨访时事，甚蒙优待。李提摩太创立广学会，香帅又助五百金。在香帅所费无多，而不分畛域，实事求是，其获益非迂腐诸公所可及。

兹寄上李提摩太辑《七国新学备要》一册，以备披览。阅之可见外国之强，并非无本。我若欲图自强，似宜察相沿之弊，无用之学，廓而清之。略仿各国造士之法，各省遍立学校，分途录用，人有专长，国无废事，庶为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也……

初六日 灯下

由陈氏是信的下半段可以得知，其设想的六门课程，皆于当时西学所设学科相类，应是其与钟氏共同所为。考其二人生平，课目所设



钟氏应占主导。

信中有月旦人物，是中肯之言的同时，亦是给沈氏鼓与呼。其所言之事，沈氏在军机处任章京，能不知乎？亦可见其用心之良苦。

信中所言金巨卿，名大廷。上海虹口人。留美幼童。归国后于天津从事医务，曾任武备学堂医官、医学堂监督。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时，其因救护伤员，遭流弹身亡。

李光九即李光久（1845—1900），字恒亨，号健斋，清湖南湘乡四十三都人，为湘军悍将李续宾之次子，承袭三等男爵。早年参加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活动，为江南候补道。光绪二十年（1894）秋天随帮办军务、湖南巡抚吴大澄北上援辽抗日，驻守牛庄、海城之间。次年2月中旬至3旬，率老湘军五营与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等部会攻盘踞海城日军，于唐王山，亮甲山、海城西北与敌激战。3月4日敌军第二路侵占牛庄时，他率部攻入牛庄，与敌巷战，将士伤亡过半，他与魏光焘仅以身免。1899年调补苏松太道，嗣调江海关道，不久晋升浙江按察使，奉命通领浙江省马步三十六营驻宁波，以防御意大利海军侵扰。著有《誓师要言》、编《李忠武公（续宾）遗书》。

陈氏不厌其烦道出旧事，意在人才难得的同时，又道出“实事求是”的重要性。

其用张之洞对待李提摩太之事，寄希望其所意想的新式学堂，要不分畛域，不拘一格，广揽人才，方能成就一番大事。其所寄之书，意在“无用之学，廓而清之”，中国庶几可有图强之希望。

是信未署年月，只有“初六日”。然而信中提及“盛观察创立洋酒公司，稟请王制军入奏”等，查《德宗景皇帝实录》中光绪二十一年五

月十七日载“署直隶总督王文韶奏，现擬招商试办酿酒公司，以收利权，并请准其专利及暂免税厘，下所司议”。由此判断此信写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六日，即公元1895年6月28日。

是函中，陈氏提出北洋西学堂所设的科目与现在的科系大体相似。如：政治门即研习西方国家的构成与政治学；译书门则与现在外语系颇有类同之处；商务则相当于现在的商学院。其余三门则属于现在理工科大学的相应科系。

由此可知，陈氏提出的科目设想，是要将北洋西学堂办成一所综合性的大学。

由是信也可以看出，盛氏请王文韶上奏折成立北洋大学堂，应是接受陈、钟二氏之设想，二氏首倡之功，不应被历史忘记。

是函的另一旁证是陈宝箴时在直隶布政使任上。

渐开风气的湖南格致化学堂

陈宝箴在直隶布政使任上，颇留心人才的网罗。他对陈襄沟通的见识颇为赏识。

陈宝箴（1831—1900），谱名观善，字相真，号右铭，出生于江西九江，晚年自号四觉老人。

陈宝箴先后任兵部侍郎、直隶布政使、湖南巡抚等职，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系清末著名维新派骨干，地方督抚中唯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派风云人物。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1900年7月22日）病逝，享年70岁。

在汪康年收藏的信札中，有邹代钧两信，分别提到陈襄。

其一有：

湘省现设制造局，系集商股购办。敝局化



矿之人，至今未得佳者，前已托鹤笙招陈石麟孝廉来湘，已允来，尚未到。后因求贤馆席需人，右帅（陈宝箴）以陈明化学，格致兼通算，即以陈主求贤馆席，而局中仍是无人。祈公商之陈次亮、容纯甫并博访通人，代谋一专精化矿者。如得其人，即恩械示，即往返械商薪水若干也。^[1]

信中清楚指出陈氏之所长。

邹代钧写此信时，陈宝箴已于直隶布政使调任湖南巡抚。

邹代钧（1854—1908），字甄伯，又字沅帆，湖南新化人。诸生。自少时即精研舆地之学。光绪间随使欧洲，历充会典馆纂修、编书局总纂。曾参加上海强学会，又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精地理学，对东南沿海及西北地区考索尤详。创立舆地学会，主修《湖南全省地图》。有《西征纪程》《蒙古地记》《中俄界记》《日本地记》《五洲疆域汇编》等。

戊戌正月，邹氏又有一函致汪康年，云：

现在湘省已将求贤书院全改为格致化学堂，已聘天津陈石麟孝廉为山长（戊子举，贵同年也）。甚好，当可渐开风气，学生五十名，今年矿事稍有收效，便当设一方言馆，可教数百余人者，专习西文，俟三五年后，择其成者，贍送出洋，分门投学，方有把握。义宁父子（陈宝箴、陈三立）之意专注于此，鄙人亦甚以为然，日夜赞助之者也。且在申开化学堂，聘外国人为师，甚好。惟学生不通语言，又太累赘。窃谓刻下开学堂，当先以西文为主，西文既通，然后分门就学，自属容易；不通西文，所得不

过一知半解。就书院改设冀开风气则可，若特开不讲西文之学堂，似可不必。君以为然否？惟刻下化矿尚是需人，陈石麟虽能化，然已为山长，不能专注此矣。

正月十二日^[2]

由上述两信中可以看出，陈襄在陈宝箴心中的位置。陈氏在湖南格致化学堂，“渐开风气”，信中也指出学生不通西文带来的诸多不便等。正当陈氏在湖南欲展宏图之际，由于戊戌政变发生后，湖南的一切新政均被废止，其并未能实现推动湖南改革的抱负。

戊戌政变后，陈襄考中进士，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九年四月，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三十四年，署贵州提学使。宣统元年，署贵州布政使，政声颇佳。

结语

鸦片战争对天津的冲击不甚明显，可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首当其冲，一批有识之士，苦苦思考如何改变现状，洋务运动的兴起使人似乎看到前途，然而甲午战争，中国一败涂地，有识之士，痛心疾首。痛定思痛之后，他们认识到教育与人才的重要性，故而天津出现诸如陈襄此类的有识之士，绝非偶然。

我们常说，北洋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是因众位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从其筹划之初就奠定良好的基础。得到朝廷批准后，经过校舍及师资力量的筹备，北洋大学堂很快步入正轨。

（供稿单位：红桥区档案馆）

[1]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年，第2693—2696页。

[2]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年，第2704—2711页。



杨柳青崇文书院山长及学子初考

刘宗江

晚清天津科名日盛，赖以书院兴盛，士子在书院研读，经名师指正，提高应试能力，以求取功名，将来步入仕途。杨柳青崇文书院在《天津政俗沿革记》卷一“舆地”乡镇一则中，有如下描述：“杨柳青在文昌阁设崇文书院，成就人材，其文艺见称于时，尤为乡镇中所罕见者。”^[1]崇文书院创建于清光绪四年（1878），创办人是当地士绅刘光先、石元俊、石作桢、周爱莲、王文彬、戴冠庆、朱宝光、王大为八人。崇文书院历史上正史记载不多，而最能体现历任掌教先后次序的便是士子的朱卷，进士杜彤的朱卷明确指明华金寿、王恩滩为崇文书院山长。而现今文史资料记载，崇文书院山长为杨柳青乡贤大儒高善观、高雁依父子。

一、杨柳青士子朱卷：石作械、刘学谦、王炳奎、杜彤

朱卷履历中的“书院肄业师”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肄业师是士子有独立学习能力之后的辅导或考课教师。课，并非授讲之课堂，而是指考试，并负责点评士子八股制艺文章。官员考课，给肄业生徒带来的不仅仅是学业督促，往往还能提供书院教师难以负担的经济资助。师课是书院山长主持的考课，又称为院课、堂课、山长课等，由山长命题、审阅试卷并划分成绩等第，由书院拨款奖励考课的优秀者。这些老师一般都是进士出身，有历次科考经验，

能真正提高士子应试能力。

现就笔者目及的石作械、刘学谦、王炳奎、杜彤四份杨柳青士子朱卷，看一下崇文书院的山长任职情况。

（一）石作械，字穉林，一字采三，号宾周，道光庚戌年（1850）三月初七吉时生，直隶天津府天津县监生民籍。

高祖起鲲，字万程，太学生，诰封昭武都尉，例赠文林郎，诰赠奉政大夫，覃恩晋赠通奉大夫工部郎中加五级。

石作械，高祖万程公，继高祖妣氏高，邑庠生讳煜公女，乾隆辛卯科举人，辛丑大挑一等分发河南，题补伊阳知县，调署保安县知县，乙卯科河南乡试同考官，讳克三公胞妹，处士，讳作宾公胞姑母，恩贡生候选州判，讳景先公姑祖母，道光甲辰恩科举人，乙丑科会试挑取国史馆膳录议叙知县讳善观公太姑祖母，诰封恭人，例赠孺人，诰赠宜人，覃恩晋赠太夫人。

石元俊，字筑岩，郡庠生，咸丰戊午科挑取国史馆膳录差满议叙知县，辛酉科举人，壬戌科会试房薦工部郎中、营膳司行走，钦加道衔，覃恩诰授奉政大夫，晋封中宪大夫，著有《望杏轩诗文集》，械受业师（为石作械嫡堂叔，崇文书院创始人）。

胞兄石作桢，号蕴轩，候选知府河工保举分发江苏前先补用，后署扬州府知府，赏戴花

[1]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6月，第10页。

翎，三品衔（石作楨是石元俊的堂侄，亦是崇文书院创建人之一）。

石作楨的书院肄业师：年姻伯辛蔗田夫子印家彦，道光甲辰恩科副举人，咸丰乙卯科举人，甲戌科进士，现官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主讲辅仁书院（由此可以看出石作楨光绪五年中举以前应该在辅仁书院肄业学习）。^[1]

（二）刘学谦，字益斋，一字地山，号退庵，生于同治甲子年（1864）七月初九日（朱卷载），系天津府天津县县学增广生民籍。

高祖世德，字配三，国学生，貤赠昭武都尉。

高祖妣氏高，邑庠生讳煜公次女，乾隆辛卯科举人，辛丑大挑一等分发河南，历署长葛、尉氏、武陟、夏邑、汜水等县知县，题补伊阳县知县，调署陕西蒲城、麟游等县知县，补授保安县知县，乙卯科河南乡试同考官，讳克三公胞妹，处士讳作宾公胞姑母，恩贡生候选州判讳景先公姑祖母，道光甲辰恩科举人，同治乙丑科会试挑取国史馆膳录议叙知县讳善观公太姑祖母，诰封恭人，例赠孺人，貤赠恭人。

曾祖妣氏杨，貤赠朝议大夫讳世兰公女，候选州同知，覃恩诰封儒林郎，晋赠朝议大夫讳世安公胞侄女（值得一提的是，杨世安是津门大儒杨光仪的曾祖父，所以刘学谦称表伯。杨光仪主讲辅仁书院多年）。

祖刘光先，字继堂，清监生，候选州同知加二级，诰授奉直大夫，诰赠资政大夫（为崇文书院创建人之一）。

刘学谦业师为：

萧枢垣太夫子，印聚星，咸丰戊午科举人，同治辛未大挑一等，分发陕西署榆林县知县，题补雒南县知县。

高曦亭夫子，印赓恩，丙子恩科进士，翰

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上书房行走。

课师计有：

华竹轩太夫子，印金寿，同治甲戌科传胪，翰林院编修，武英殿纂修，国史馆纂修，现任河南学政。

王晋贤夫子，印恩淮，丁丑科进士，翰林院检讨。

太年伯辛蔗田夫子，讳家彦，同治甲戌科进士，翰林院编修。

王云舫夫子，印文锦，同治辛未科进士，翰林院侍读，上书房行走。

表伯杨香吟太夫子，印光仪，咸丰壬子科举人，拣选知县。

李铁梅夫子，讳嘉端，道光己丑科翰林，前安徽巡抚。

张幼樵夫子，印佩纶，同治辛未科进士，前翰林院侍讲学士，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时主讲问津书院）。^[2]

（三）王炳奎，字星垣，号曜章，一号策六，生于咸丰壬子年八月二十六日，卒年不详。系天津府天津县县学增广生民籍。

父，王文彬，字雅亭，附贡生，候选国子监典籍，敕授登仕郎（为崇文书院创建者之一）。

业师计有：

王重三太夫子，讳振纲，道光戊戌科会员，候选知县。

王菊农夫子，名鑑，咸丰辛酉科拔贡，同治甲子科举人。

华竹轩太夫子，印金寿，同治甲戌科传胪，翰林院编修。

课师计有：

王晋贤夫子，印恩淮，光绪丁丑科翰林。

辛蔗田夫子，讳家彦，同治甲戌科翰林。

[1] 来新夏主编：《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第98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12月，第275页。

[2] 来新夏主编：《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第98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12月，第461页。



王云舫夫子，名文锦，同治辛未科翰林。表叔杨香吟夫子，名光仪，咸丰壬子科举人，拣选知县。

张幼樵夫子，名佩纶，同治辛未科翰林，左春坊左庶子，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时主讲问津书院）。^[1]

（四）杜彤，字子丹，号仰滋，生于同治丙寅年（1866）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津府天津县县学廪膳生民籍。

业师计有：

表兄高芝巘夫子，印学勤，庠生。

尹澄甫夫子，印滩，同治癸酉科举人，光绪庚辰科会试大挑一等分发浙江知县。

课师计有：

华竹轩太夫子，印金寿，前主讲崇文书院。

王晋贤夫子，印恩滩，前主讲崇文书院。

杨香吟夫子，名光仪，主讲辅仁书院。

张幼樵夫子，印佩纶，前主讲问津书院。

黄再桐夫子，印国瑾，前主讲问津书院。

李越漫夫子，印慈铭，主讲问津书院。^[2]

由刘学谦与石作械的朱卷可以发现，他们两人的高祖母为亲姐妹，高祖父刘世德与石万程同为高氏连襟，即庠生讳煜公女。高煜，字暎藜，庠生，诰赠文林郎。此前有资料记述石万程娶进士高衍龄之女不实，高衍龄确系高氏族人，为岁进士，即岁贡生。

高氏家族的祖先、元代太学生高居宝于元至正十五年（1355）迁居至杨柳青，是定居杨柳青的第一代人，也是杨柳青本土文化早期的开拓者与传播者，高氏也因此成为当地的重要望族。

细心的读者可能在石作械与刘学谦的朱卷记述里发现了高景先与高善观。高善观，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恩科顺天乡试中式举人。

具《道光甲辰恩科直省同年录》载：“高善观，字止于，号镜汀，生于道光癸未（1823）十月二十一日，天津府天津县廪生民籍，曾祖克三，字兰溪，乾隆辛卯举人，陕西保安县知县，祖作宾，字弼廷，父景先，字仰山，廪生，候选直隶州州判，娶郭氏，子金台、金鳌。”其父高景先系《重修文昌阁碑记》作者。一说高善观为崇文书院山长，从以上四份朱卷不难看出，高善观并未出现在朱卷内，也不是四人业师，更不是崇文书院山长肄业师。又说，“其子高雁依”在高善观后任山长，高雁依，此人不详。如前同年录记载：“高善观，子金台、金鳌”，“雁依”或其一人之字号，亦未可知。确切资料记录高善观有两子，即高学勤与高学诚，可能是“金台、金鳌”后来改了名字，高学勤确系杜彤业师之一。以上高氏家族资料，参看了杨柳青博物馆内“高氏家堂家族世系图”。

二、崇文书院山长：华金寿、王恩滩、华学澜

从刘学谦、王炳奎、杜彤三份朱卷，可以清晰看出华金寿出任崇文书院山长在先，王恩滩在其后，刘学谦与王炳奎于光绪八年（1882）壬午科中举，时王恩滩在崇文书院任山长。此后三人又分别在辅仁书院与问津书院肄业学习。

先谈一下早期崇文书院山长华金寿，字铜士，号竹轩，亦号祝萱。本名“铸”字，因“铸”与咸丰帝之“詃”字音同，故拆“铸”字为“金寿”二字，生于道光己亥年（1839）十二月初五日，卒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初一日，享年六十二岁。直隶省天津府天津县人，其家族为天津“北华”科举世家，同治六年（1867）丁卯科，乡试中式第二十四名，举于乡，同治十三年（1874），甲戌科登进士二甲一名，称“传胪”。

[1]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原汉和图书馆）数字化古籍善本：顺天乡试同年齿录，光绪壬午科（1882）。

[2] 来新夏主编：《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第98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12月，第431页。

历史上关于华金寿的生平资料记述不多，仅见于高凌雯编纂的《天津县新志》卷二十一，人物（四），其中有“华金寿、族子学澜”一则小传。恰巧华学澜亦可能是崇文书院山长，见后文。

县志记载：“华金寿（1839—1900），原名铸，字铜士，号竹轩。父玉墀，举人，官知县。金寿同治六年举于乡，十三年二甲一名进士，改庶吉士。光绪二年（1876）散馆授编修，五年（1879）充湖南乡试正考官，十一年（1885）提督河南学政，十八年（1892）升右春坊右赞善，明年转左春坊左赞善，督山东学政，历左、右中允，司经局洗马，翰林院侍讲、侍读，左、右庶子，二十三年（1897）迁翰林院侍讲学士，二十四年（1898）转翰林院侍读学士。是年充武会试副考官，授詹事府少詹事，升詹事。二十五年（1899）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二十六年（1900）授工部右侍郎，调户部右侍郎，署工部左侍郎。是年充福建乡试正考官，旋诏停直省乡试，闻命回京，道卒无锡。金寿性行端谨，未达时束身潜修，不预外事，然遇乡里后进奖励提撕惟恐不尽；既入翰苑，屡掌文衡，凡所拔擢以雅正为宗，力黜奇异，回翔清署历二十年之久，甫跻卿贰（升侍郎）值国步颠蹶。忧恐惊疑，遽尔殒谢，生平抱负不及设施，人争惜之。卒年六十有二，遗疏上，赐恤如例。子学涑，举人，官主事。”^[1]

王恩滩（1842—1901），字荩贤，号梦竹，一号晋仙，生于咸丰辛亥年（1851）二月十三日（朱卷载），直隶省天津府天津县人，同治丁卯年（1867）中举人，乡试中式第一百十三名，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进士，会试中式三甲第四十七名。陆辛农《天津书画家小记》载：

“王恩滩，善书，与王仁堪时称‘南北王’。曾见其扇头小品，于瓷青绢地以赤金端书小楷，极谨严娟秀之致。”

著名殷墟文字专家、书法家王襄便是王恩滩的胞侄。王襄在《先伯御史公事状》里对胞伯王恩滩记述如下：

“先伯讳恩滩，字晋仙，号景贤，亦号静闲，晚号耐园，自吾远祖去浙徙天津，遂世居县城。生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十三日，幼年读书聪于常童，塾师谓王氏将以读书显矣。长为杨竹友先生弟子，工制艺，后之成进士即基于此。杨氏盖路润生先生再传弟子也，制艺之学渊源，固有自也。先伯以同治丙寅年补县学生，翌年丁卯（1867）举于乡，光绪丁丑科（1877）中进士，官翰林院检讨，后以御史记名，未及传补，因病目告归还里。卒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二十四日，时年五十有九岁，葬于城西北斜村祖茔。清廷赐同进士出身，敕授儒林郎，诰授奉政大夫。著有《四戒草堂制艺》、《馆课赋钞》各一卷，藏于家。

先伯官检讨，食贫守约，以授徒所得修脯为膏火之资，僦僧舍而居，怡然自乐。……先伯固寒，肃持受徒所入为生，反以资资人，生平之重友谊，多类此。”^[2]

通过如上记述可以看出，王恩滩确以教徒授业为生。

华学澜（1860—1906），字瑞安，号莱山，天津人。出生于咸丰十年（1860）十月十四日，光绪十一年（1885）应顺天府乡试，中乙酉科举人，次年参加丙戌会试，联捷成进士，得二甲第九名，改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居京时，长期寄居在堂叔华金寿家，为其子华学涑授读，

[1]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中），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6月，第804页。

[2] 王襄著，唐石父、王巨儒整理：《王襄著作选集》（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第2165—2167页。



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华学澜丁父忧，三年后服阙期满，重回翰林院供职。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奉旨任贵州乡试副考官。二十九年（1903）清廷借闱开封举行会试，任会试同考官，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易进士馆教务提调，在京师大学堂给新科进士教授数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被荐升为翰林撰文，惜五月初三日，因病发，未得任事而故去，年仅四十七岁。华学澜在甲午之后开始钻研西学，兴趣主要是精研算学。华学澜就《益古演段》一书中的64道算数题以代数法解之，写成《益古演代细草》一卷，又有《衍算草》及《算存》各一卷，合为《瑞安算书》三种。

华学澜在《己亥日记》与《庚子日记》里，清晰地记录了为杨柳青崇文书院和辅仁两书院批改课卷，以及批改后寄出课卷，总计有六七十处。记述次数虽多，但大都简练，诸如，“某日阅卷数本”，又或，“某日发崇文课卷”。华学澜其任职时间或为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丁父忧解官回家以后，在崇文书院是否任山长未见记录。抑或代某位山长批改课卷，华学澜如果任崇文书院的山长肯定与其族叔华金寿有关。抑或与同在京城为官的丙戌同年好友刘学谦有关，华学澜与刘学谦及其他京官终日在一起聚饮，谈论时事，这在其日记里多处记载。

三、杨柳青灯箱画里的崇文书院师生

有关崇文书院师生的历史记载稀少，而最有历史价值的莫过于现今留存的灯箱画，幸在杨柳青博物馆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灯箱画是崇文书院师生共同完成的。书院成立后聘请了当时名画师阎玉桐，从劝善经书《文昌帝君阴骘文》中摘出其格言若干句，按其语意，构思绘图，灯箱画共二十四盏，师生二十四人，题

字落款，每年岁末除夕至翌年正月元宵节，在文昌阁围墙里外，各贴壁张挂十二盏，张灯结彩，庆贺观赏。由于年代久远，博物馆现仅有十八盏。

现就笔者目及的师生资料，记述如下：

解开元（原名开先），字梅舫，咸丰八年（1858）戊午科副榜贡生，同治七年（1868）曾为棗城教渝。光绪二年（1876）复参加省试，中丙子科举人。乡试中式第二百三十三名。时年三十九岁。解氏亦是天津名门世家，天津史学家高凌雯在其《志余随笔》中说：“梅氏、解氏，俱有门望，累世清芬，但无贵显，故天津旧有‘寒梅瘦解’之称。”^[1]

周恒昌，光绪元年乙亥恩科举人，乡试中式第一百六十五名，时年二十岁，直隶天津府天津县民籍，县学附学生。

刘文蔚，字霞轩，号镜澈，朱卷载生于咸丰癸丑年二月十四日，天津府天津县县学，增广生民籍，光绪元年乙亥恩科举人，乡试中式第三百十八名。刘氏本镇大粮商庆源号家族，曾做广西永福县知县、署灵川县知县，后改甘肃伏羌县知事。

刘恩源，字季霖，号问荃，一号润珊，清附生，光绪五年己卯（1879）科举人，己丑（1889）大挑一等分发山西巩县知县，钦加同知衔，诰授奉政大夫，赠封资政大夫，谱载生于咸丰七年（1857）丁巳八月二十日，卒于民国五年（1916）丙辰十二月初四日，享年六十岁。

石作械，光绪五年（1879）己卯科举人，乡试中式第二百一十九名。历官河南省永宁县知县、署项城、宁陵县知县。

刘学谦，谱载生于同治元年（1862）壬戌七月初九日，于民国五年（1916）丙辰二月十

[1]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6月，第717页。



一日，在北京太仆寺街背阴胡同本寓去世，享年五十五岁。光绪八年（1882）壬午科举人，乡试中式第一百五十八名。光绪十二年（1886）会试中丙戌科进士，会试中式第四十名，殿试二甲第六十名。十五年（1889）散馆授职编修，充国史馆协修。二十三年（1897）六月，充陝西乡试副考官，十二月补山西道监察御史。二十五年（1899）掌云南道监察御史。二十九年（1903）闰五月充福建乡试副考官。三十年（1904）十月转补工科掌印给事中。三十二年（1906）五月选授四川永宁道，十二月报捐二品项戴。宣统三年（1911）六月二十八日奉旨补授浙江金衢严道。夏历1912年7月任直隶禁烟局总办。

王炳奎，光绪八年（1882）壬午科举人，乡试中式第一百七十一名。加五品衔封典。

杜彤，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举人，乡试中式第二百四十四名。十八年（1892）壬辰科进士，会试中式第一百五十一名，殿试二甲第十四名。《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载：“杜彤，字子丹，号仰兹。直隶天津杨柳青人。光绪翰林，任新疆提学使并署布政使。善行楷。于时，翰林书皆馆阁体，独子丹能魏书，拔俗出众。”^[1]光绪二十年（1894）散馆一等，授职编修。二十七年（1901）补湖广道监察御史。三十一年（1905）二月，补山东道监察御史。三十二年（1906）四月二十日奉旨署理新疆提学使，开缺以道员用。同年六月，杜彤赴日本考察，会晤文部大臣，视察日本教育制度。宣统二年（1910）十月，署理新疆布政使。1929年9月，杜彤突患肠胃疾病，在天津城里英租界去世，享年六十四岁。

王兆泰，直隶天津县廪膳生，生卒年不详。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恩科举人，时年三十

六岁，候选教谕（翰林刘学谦从堂弟刘学范之岳父）。

刘学濂，字欣莲，谱载生于同治五年（1866）丙寅九月十三日，卒年不详。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举人，历官国子监候补学正学录、巡警部机务所七品小京官，改民政部警政司主事、民政部疆理司员外郎，奏保巡警道，诰授中宪大夫，民国内务部职方司主事，内务部工木司主事，内务部记名金事（刘学谦胞弟）。

齐徵，字鉴斋，生卒年不详。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举人（通州商籍），内阁候补中书，吏部七品小京官，升主事。

周乾晋，生卒年不详。光绪二十七年岁贡生（翰林刘学谦从堂兄弟刘学鑑之岳父）。

高杞年，字筱岩，附生，生卒年不详。甘肃新疆县丞，署莎车府回城巡检。翰林杜彤业师高学勤之子，大儒高善观之嫡孙。

周恩树，生卒年不详。宣统元年，恩贡生。

王骏清，字礼圆，庠生。生卒年不详（王炳奎朱卷载，为其嫡堂侄）。

周嘉树，庠生（不详，县志未载）。

王骏基，庠生（不详，县志未载）。

李绮元，庠生（不详，县志未载）。

杨柳青崇文书院历史记载不多，存世二十余年，却也培育出进士两名，举人十余名，为杨柳青古镇文明留下了辉煌的历史痕迹。崇文书院山长，目前笔者仅查到华金寿、王恩滩、华学澜三人。他们可能亲自来崇文书院对士子考课答疑，抑或是通过书信命题，批改课卷，而那些襄教（助理教师）或直接面授，或批改考课试卷，有待于更多的史料考证。希望大家挖掘更多的史料，来纪念这些在崇文书院培养杨柳青士子的先贤们。

（作者单位：天津中轻机械有限公司）

[1] 乔晓军编著：《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补遗一编，三秦出版社，2007年7月，第246页。

20世纪天津特二区的三家老画报

侯福志

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天津特二区（前身是奥租界）胜利路（今河北区北安道）12号，曾有三家老画报，分别是《北戴河画报》《美丽画报》及《星期五画报》。这三家画报发行人为曹养田，主编则为李逊梅（笔名梅花生），编辑为石愚吾等。由同一人创办三家画报，这在天津报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北戴河画报》

《北戴河画报》创办于1947年1月，属综合性文艺画报，每周一期，逢周日出刊。初期为方形画报，每期12页，自40期之后改为16开本，每期也增加到16页。虽称画报，但实际上仍以文字为主，兼有图片、插图和漫画。内容以戏剧、电影、杂要和小说连载为主，设有“世界新闻”“沽上风光”“春申影报”“梨园捷报”“旧剧讲话”“坤伶动态”“菊坛佳话”“戏剧之页”“杂耍圈”等小专栏。在有关电影内容里，有在上海谋生的天津籍沈浮、谢添、石挥、魏鹤龄等导演、演员在天津的活动情况，这对于研究天津电影史无疑具有史料价值。在

“杂耍圈”栏目，经常与读者见面的有侯宝林、张寿臣、阎秋霞、林红玉、花小宝、石慧儒等京津艺人，对研究天津曲

艺史自然也十分宝贵。当然，戏剧内容应当是最多的，涉及梅兰芳、尚小云、孟小冬、马连良、李保罗、李少春等当红名伶以及近云馆主等名票友。

自画报创刊起，连载武侠小说家郑证因的《贞娘屠虎记》，梅花生的戏剧小说《苏三起解》。后来陆续增加了曹龙孙的电影小说《重逢有日》，梅花生的《艺海传奇》《镜中人影》《水国烟云》等中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肉的复活》，还有徐春羽的《裙带狼烟》、郑证因的《蓉城三老》等。

该画报在内容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刊载一些有关天津的风物掌故。如刘剑的《无墙的天津城》《河北鸟市》，石愚吾的《天津三宝鼓楼》《七炮台怀古》《张立山智擒飞贼》《西沽看桃花》《歌场漫话》等。

刘云若的津味小说，为该画报增色不少。笔者发现在1947年4月27日出版的第16期首页，有一则名为《本刊特别预告》的广告，内容是这样的：“刘云若先生，为华北最著名的小说家，早已口碑载道。今应本刊特约，自17期（5月4日）起，连续撰著长篇社会小说《烟月楼台》，奇情曲折，超过在其他刊物所载之一切小说。请读者注意为荷！”

笔者所见《北戴河画报》一共只有38期，连载《烟月楼台》这部小说一共17次，其中第17次刊于1947年9月21日出版的第37期上，而第38期未连载。内容全部为第一回，回目是“烽火弥天鸳鸯初作侣，竹歌匝地风雨忽摧花”。该章主要内容是：世家破落子弟尹竟生，父母双亡后，家产俱尽，孑然一身，住



在已经分居的伯父家中。他本身十分聪明，中英文都有功底，白天在洋行上班作书记，晚上在报馆当编辑，所以收入很好，又没有负担，能够优游自乐地过日子。父母去世时候，自己才十七八岁，无人管束，尽情放纵自己放荡不羁的本能，把遗产耗尽。故事是从七七事变开始的，因为中日开战，日租界戒严，法租界过不去，华界也去不了，只得在日租界妓院暂时栖身，从而结识了妓女倩君。刘云若通过妓女之口，用大篇幅介绍了妓院的生态，是了解民国时期天津妓院黑幕难得的资料。笔者曾见到过一本刘云若撰写的名为《返照楼台》的小说，由上海广艺书局出版于1949年8月，但回目与《烟月楼台》并无相同之处，不知这两部小说是否有联系，也只得待以后研究了。

据周利成先生《天津老画报》一书记载，截止到1948年12月第92期，《北戴河画报》宣布停刊。

《北戴河画报》是一份方形报纸，就其体量和形式上看，实际上相当于一份杂志。由于连载过郑证因、刘云若、梅花生、徐春羽等京津两地作家的作品，所以使这份画报具有可读性，在保留文献和传承天津历史文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丽画报》

《美丽画报》创刊于1946年9月。该画报亦为方形周刊，逢周四出版，长宽尺寸各为25厘米，每期12页。封面、封底为套红印刷，看上去颇为大气。

《美丽画报》刊载的文章主要是电影、戏曲演员演出消息及名人轶事，并配以大幅“明星照”或“剧照”，此外是社会新闻和小说连载。

有关电影、戏曲演员的消息，多是花边新闻，用以博得读者眼球。如有一篇《唐大姐若青》的文章，披露了“旅行话剧团”唐氏父女



“腐化的私生活”。该文提到，唐槐秋“溺于烟赌”，女儿唐若青“把恋爱当作玩戏儿”。基于上述情况，“经济拮据也是必然性的后果了”。其实这种暴露演员隐私的文字，实在没有什么价值，但作为花边新闻，它会引起读者的兴趣，这不过是此类小报赖以生存的一种手段罢了。

在电影、曲艺消息中，有关天津的内容更有价值。如1946年10月17日出版的第3期，提到了著名漫画家朋弟客串演出《乌龙院》的消息。据梅花生撰写的《田菊林与朋弟》一文载，田菊林在平津名气稍差，在外埠码头却十分走红，尤其是在青岛。她在天津的时候，时常参加义务戏演出，尤其和名画家朋弟配戏次数多。“朋弟笔下的漫画，长篇连读，以《老百姓》《阿摩林》《老夫子》等游戏人物，最为脍炙人口，可是他对于旧戏的修养也很充足，粉墨登场，不次于内行。”另据考证，朋弟的确是个多面手，除漫画、戏曲外，他还是一个乐手，20世纪30年代，他自己曾专门成立一个乐队，在各大舞场伴舞。

在1947年4月10日出版的第28期，曾刊载一篇名为《沈浮将来津拍摄外景》的消息，文中提到了沈浮、谢添二位导演的情况。据该文介绍，沈浮的《追》开拍后，内景拍了好多镜头，外景也有几处。沈浮连日在北平西山摄



影，之后将来天津，“在津拍摄外景，为东亚毛纺厂的工厂内工作之情形，及东亚毛纺厂之厂外情况，均须摄入镜头。闻来津拍外景之演员，只有谢添等三四人，预料沈浮来津拍摄外景时，东亚毛纺厂前，又为一般影迷所包围”。

《美丽画报》创刊不久，便陆续开始连载郑证因的《边城侠侣》和梅花生的《妖幻》，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为武侠，一部属志怪。无论是哪一部，里面的人物或刀光剑影，或飞檐走壁，非普通人可比。20世纪40年代，正是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在此情况下，作家把希望寄托在侠客、神怪身上，一方面体现了作者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另一方面暴露出作者因在现实中看不到光明而另辟蹊径的心路历程。

《星期五画报》

《星期五画报》创刊于1947年8月1日。编辑先是李逊梅，后改为王秋风。该画报为综合性文艺刊物，逢每周五出版一期，16开本，普通新闻纸，每期16—17页不等。封面为红黑双色套印，内页为黑色。该画报于1948年10月终刊，总计出版了69期。



根据《发刊词》，我们可大致了解该画报的创办宗旨和主要内容。“星期五是耶稣受难日，我们现在虽都不是耶稣，但在这个时代，其受着大苦大难则一。因为这个意思，我们创刊了《星期五画

报》。”“《星期五画报》的内容，是个综合性的刊物，它将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在帮助一般人正确地理解国际形势的目的下，我们将尽量介绍一点儿世界知识、科学常识。在增进一般人对艺术的爱好之目的下，将尽量刊登一些有关戏剧电影的文字，又在普遍地介绍家庭生活知识的目的下，特辟了妇女与家庭版。总之，只要有益于各阶级生活的文字，将无不网罗在内。”

《星期五画报》最突出的亮点有三个方面：一是每期设有《漫画之页》，放在首页。除刊载朋弟等名家的漫画作品外，还连载傅基的《漫画研究》。傅基毕业于北平艺术专门学校，毕业后从教，是知名的漫画家。《漫画研究》于1948年3月由该画报社结集出版，有70余页，内附漫画数十幅，发售价2元。二是游艺类专刊专页。涉及电影、曲艺和戏剧等方面内容，保留了大量天津演艺史料。包括曹禺、黄宗英、周漫华、花小宝、郭小霞等艺事活动，其中有关鼓姬林红玉的史料尤为丰富。三是小说连载。有梅花生的《玫瑰花王》、徐春羽的《铁马银旗》、耿郁溪的《樱桃绽》、刘雁声的《如意珠》、郑证因的《十二连环索》、刘云若的《故国啼鹃》等。除郑证因、刘云若、梅花生等津籍作家外，徐春羽、耿郁溪、刘雁声等均为北平籍有重要影响的作家或报人，可见《星期五画报》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

《故国啼鹃》是刘云若的一部社会言情小说，自1947年8月1日在创刊号连载，一直到该画报停刊时结束。这部小说只有一回，回目为“临水弄鸳鸯潮来有信，升天笑杂犬花落无声”。笔者见到《星期五画报》第61期连载的《故国啼鹃》为第53次，据此推断此小说连载基本在60次左右，按照每次2000字计算，约合12万字左右。

(供稿单位：武清区地方志办)

杨柳青运河旁的小商业

张一然

京杭大运河的修通催生了不少因运河而盛的地区，杨柳青地处京杭运河入京之要冲，因为南来北往的舟子旅人、商贾政客提供歇脚打尖的便利，逐渐成为津西商业重镇，被誉为运河明珠。

穿镇而过的大运河为杨柳青的人口积聚、商业繁荣、地区发展提供了必备的基础，河沿大街、估衣大街、猪市大街等街巷沿运河北岸平行展开，热闹繁荣。据《西青区志》记载，民国初年，杨柳青有坐商 500 余家。除了商号铺户外，杨柳青的行业历史也是异彩纷呈，形成杨柳青经济发展的另一条支脉。但随着社会进步和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在过去兴隆火爆的行业已悄然无迹，例如水铺、澡堂、脚行、麻行等。幸运的是，笔者有幸采访到杨柳青掌故老人王鸿书，这些消失的行业都是他曾亲眼见过，亲身体验过的生活。

运河边的老澡堂子

现代人的家里都安装了热水器、淋浴等设施，经济宽裕的家庭甚至安装了浴缸，人们在家里洗澡很方便。但在旧社会，洗澡可不是一件简单事。自社会兴起洗浴业始，其设施就有优劣、高低贵贱之分，穷苦百姓想要洗澡只能到澡堂子里，花钱洗澡。

老澡堂子从侧面体现出城市变迁，并承载着地区居民的情感记忆。澡堂子作为平民文化微小空间，对其关注研究者甚少。有关杨柳青老澡堂子的记录至今寥寥无几。笔者在发掘研究大运河相关历史文化、做田野调查时偶然得

知杨柳青掌故老人、1942 年出生的王鸿书童年时代曾多次去过杨柳青镇的澡堂子，有些许事情至今仍记得很清楚。

杨柳青因水而盛，京杭大运河贯通，漕运兴起，商业日渐发达，商贾云集。来往的客商大多喜欢在澡堂里泡一泡，不仅省却了打洗脸水的麻烦，还能与友人边泡边聊。

澡堂最初可以说是由皇室发明，只供皇室成员使用。追溯澡堂的历史，明朝罗欣在《物原》中有“高辛氏始造为浴”，“浴”便是澡堂最初的称谓。这里的高辛氏指的是“帝喾”，五帝之一，尧的父亲，司马迁说他是黄帝的曾孙。

北魏散文家杨炫之所著的《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西宝光寺的园子中置有浴堂，其主要功能还是为僧人洁身，供奉佛事。由此可见，发展至南北朝时，澡堂随佛教的传播普及到各地，但那时的澡堂仅供僧众洁身礼佛使用。

直到清代，澡堂子才真正普及到社会大众并发展起来。旧时的澡堂子包含着浓厚的等级观念，分有档次等级。以京津两地为例，最高档的澡堂子是头等官堂，次之是普通官堂，三等为盆堂，最次等的是散座。不同档次的澡堂子服务的对象截然不同，提供的服务自然也分三六九等。

杨柳青与澡堂的渊源很深，甚至有两条胡同的名字来源都与澡堂相关。一条是老塘子胡同，位于杨柳青中部，估衣街南侧，过去属杨柳青街道办事处。南起河沿大街，北至估衣街，长 39 米，宽 2 米。两侧为砖木结构平房，土路。截止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有居民 19 户，52



人，均为汉族。相传于清乾隆年间形成，有一李姓在胡同内开设澡堂，且是该镇最早的澡堂，故名。另一条是串心塘子胡同，位于杨柳青中部，估衣街南侧，过去属杨柳青街道办事处。南起河沿大街，进巷向北50余米处西拐往北，东折北去至估衣街，长82米，宽2米，两侧为砖木结构平房，土路。截止到20世纪70年代，有居民12户，36人，均为汉族。相传于清道光年间形成，原巷内有一严姓开设的澡堂，后胡同串澡堂而过，故名。

新中国成立前的澡堂子形成于封建制度的社会背景下，带有明显的封建性质。杨柳青镇作为市郊农村，更是只有男澡堂，没有女澡堂，且全部属于低档。镇上的富裕人家大多在家中使用浴盆洗浴，以图方便、卫生。到澡堂洗澡的人多为普通百姓或穷苦人家，富裕的人大概两三天一洗，穷人十天半个月也未必能到澡堂泡一泡。

据王鸿书回忆，新中国成立前，杨柳青镇大概有三家澡堂子，全部建造在运河岸边。一是处于药王庙大街、老大桥东的周家澡堂子，堂名“清泉池”，老板名为周宝禄。二是处于河沿大街的张家澡堂子，堂名“新泉”。三是处于估衣街东的王家澡堂子，堂名“聚华”，老板名为王少良。

这三家澡堂均没有天津市内澡堂的莲蓬淋浴，只有面积约为18平方米大小的池塘一座，深度大概在1米至1.5米左右。每日晚间结业后，工人将池水放净，污垢清理。

每一家澡堂的外墙根都整齐地摆放着一溜大水缸。王鸿书说：“20世纪40年代的杨柳青运河水都是很浑的黄泥水。”所以，澡堂的小工每天傍晚从运河挑水填满所有的水缸，静置一夜沉淀澄清。转天清早，小工便在后院用大灶烧水灌满澡堂。这一池水整天不换，一直使用到晚间静堂（闭店）。偶有逢节一天换水两次，店家便会在店门口贴纸公告。

北方的澡堂子通常都讲究一个“舒坦”，澡

堂子除了提供洗浴服务之外，往往还兼营茶水、理发、刮脸、搓澡、修脚、按摩、治脚气、修指甲等多种服务。但时年王鸿书不到十岁，对这些服务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他只记得澡堂子门口竖着比其他商户高一截的幌杆子，杆子上挂着一盏红灯笼。澡堂子的灯笼是长圆形，上面写一“堂”字。挂灯笼表示澡堂子营业中，顾客可以随时进门。不挂灯笼，就表示水还没有烧开，或者是歇业。澡堂子门口一般会贴富有行业特色、描述该澡堂特点的对联，但年月太久，王鸿书已毫无印象。

洗澡是旧社会百姓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在一些严重缺水的高原地区，穷苦百姓一生只洗三次澡，即出生、结婚、逝世。可见洗澡对穷苦人家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因杨柳青运河水浑浊，且来往船只较多，孩子们不能像其他农村那样夏季可以下河洗澡，除了在家用毛巾擦洗了事，想要洗个痛快澡就必须得到澡堂子里。杨柳青是津西的重镇，南乡北村的乡民逢集便聚集在杨柳青。尤其是过年前的那几天，庄稼人常常是一大早就领着儿子涌向只有（杨柳青）镇里才有的澡堂子，这种种缘由使得杨柳青的澡堂子生意很火。

旧时洗澡，懂行的人都是一大清早“顶门就去”。因为池子里的水是大清早换的新水，最干净。王鸿书说：“现在想起来当时洗澡的水，脏得人直恶心。”那么多人在池子里又搓又擦，不一会水面就飘起来厚厚一层混着肥皂沫的体垢。往往是澡堂开门不大一会，池子里的水就混得跟米汤一样。时不时还有工人用一种工具从池子里撇起沫子往外倒掉。

“进了大门，厅堂里摆着两溜条凳，挨着墙根有很多柳编筐。人们一般是用报纸或布头裹好干净的衣服带着。进去后，坐在条凳上脱衣服，把脱下来的衣服和裹好的干净衣服都放在柳编筐里，搁到墙上的柜子里。洗完后，穿干

净的衣服，脏衣服再裹好带回家清洗。澡堂子提供木拖鞋，拖鞋上的带子是磨坊废弃的皮带做的。”王鸿书回忆：“小时候，我常常被父亲带到澡堂子里洗澡，甭管多浑的水，照样洗得清爽。那时候人们压根也没见过特别卫生的生活，经济不宽裕，所以也不太讲究，也就不会嫌弃澡池的水脏。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旧时百姓的生活了。这些回忆就当是给后辈人查问历史时的一个参考。”

杨柳青水铺

现代人从来没有为喝水发愁，家家户户都有纯净水或净水器，喝起水来既干净又方便。但在过去，无论是城里还是农村，喝水都不是一件简单事，于是催生了一种行当——水铺。老天津人都有到水铺买开水的习惯。

杨柳青依运河而兴盛，但因源自黄河水，所以水很浑浊。元朝文学家揭傒斯所作《杨柳青谣》中即有“杨柳青青河水黄，河水两岸苇篱长”的诗句。

原本浑浊的运河水，经农家大灶烧开，更是难以下咽。那时候的农村人家中没有炉子，烧水做饭用的是玉米秸、野草等，从不讲究买煤烧，毕竟煤比较贵也稀缺。炒菜、蒸饭、炖肉……全靠土灶大锅一力承担，很少有人家会专门备有烧水的锅。所以，土灶上的大铁锅烧菜后即使刷得再干净，烧出水来，仍旧有股子油星味。过去的人们过日子比较节省，通常都是在做饭前才点大灶，借着做饭烧柴火的机会烧锅热水，基本不会单单为烧壶开水专门点灶。故而，家家户户喝水都得到水铺去买，无形中催生了水铺业的兴旺。

据王鸿书回忆，新中国成立前的杨柳青共有十三家水铺，包括位于后大街的梁记水铺、估衣街南的张记水铺、药王庙西的郭记水铺和孙记水铺等。镇内最大的水铺当属位于“三不

管”的于家水铺和老公所口的卞家水铺。因年代久远，已不记得这些水铺的堂号。

杨柳青人通常是每日晚间用车从运河拉水，车上有高1.5米左右的大圆木桶，木桶底部有孔和水管，用于放水。除了于家和卞家的水车是用牲口拉车外，其余水铺的水车均靠人力推拉。从运河装好水运到铺内，伙计便将木桶底部的水管打开，把桶内的水倒入大水缸里，加入明矾，然后用大竹竿使劲转圈搅拌，一直搅到缸里的水出现漩涡，这才算合格。将运河水搅拌澄清后，往往静置一夜后使用。因此，杨柳青镇的人家，不管是大富之家，还是穷苦百姓，家家都有个大水缸，专门为了存储净水。

这些水铺都设在屋内，一口或两三口大锅烧着沸水。水铺一般还专门有个厢房存放煤和柴草，防止阴天受潮，保证雨天也不误营业。

水铺是勤行，别看只是烧水，伙计们是非常辛苦的，通常半夜三四点就起床点火烧水。小水铺一般只有一口大锅，大水铺往往有两三口大锅，有的用煤烧，有的用玉米秸柴火烧。用煤烧出来的水是饮用水，用柴火烧出来的热水一般维持在六七十度左右，是给富裕人家洗漱用的。水温不一样，燃料不一样，价格自然也不同。

大概清晨五点左右，水铺的第一锅热水就烧好了。因为农村人起得早，通常五点就都起来了，这时候泡茶、洗漱都需要用热水。水铺的买卖从大清早就算开张了。

家里有半大小孩的，大人一般都让半大小子、姑娘，拿着大铁壶到水铺买热水，一毛钱一壶。杨柳青人管这叫“倒水”，“到水铺倒壶水去”，就是买一壶开水的意思。

一般来说，杨柳青的富裕人家天天喝的就是水铺用煤烧出来的开水，他们买了开水后，存储在暖水壶里，喝完再去买，从不喝自家大灶烧出来的水。那些有钱人家洗漱用的热水也



是从水铺买的。普通人家比较节省，每天买上一两壶开水，在特定时间，比如清早大人泡茶喝，小孩子吃饭时配着热水喝，其余时候就喝家里大灶烧开的带油星子味的水。穷苦人家基本不买水，中午或晚间做完饭后，用大铁锅烧上一锅开水，然后用土灶里柴火的余温温着铁锅，也能喝上热水。如果家里来了客人，才会去水铺买上一壶开水，专门给客人泡茶喝。况且，穷人家一般也买不起热水壶，一壶开水万一喝不完就变成了凉水。

水铺有个特点，啥时候去买水，大锅总是“咕嘟、咕嘟”地响个不停，不懂行的人以为锅里的水总是开的。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一是水一直沸，锅里的清水消耗太快，水蒸气会灌满水铺。虽说运河水不花钱，但伙计们挑水、净水需要时间。二是千滚水（沸腾了很长时间的水）其实并不好喝，影响口感。三是浪费煤火。天津卫过去有句俏皮话：“水铺的水——不开”，指的就是别看水铺大锅总是咕嘟地响，但水并不开。“咕嘟、咕嘟”的动静是从扣在锅底的大碗下发出的。如果有人买开水，伙计临时加火烧开。如果只是打热水洗漱，伙计就不会捅旺炉火了。另外，到水铺买水，必须说明是干啥用的。要说泡茶，那必须是开水，水不开就是砸招牌的大事。若是洗脸等其他用途，伙计卖的就是柴草烧的温水。

水铺的生意一年四季都特别好，除了普通人家用水，逢集时附近村庄的人们到杨柳青赶集更需要热水喝。杨柳青是津西重镇，商铺林立，富裕人家比较多。一大家子清早的洗漱饮用，这得是多少热水啊！故而，杨柳青水铺的买卖都十分红火。一间小水铺养活一家四五口人没有问题，只是因勤行会特别劳累。

水铺在卖水之余，还从事挑水送水的业务。伙计们专门为没有壮劳力的家庭从运河挑水灌满水缸，碰见好心的伙计，还会帮忙放入明矾

搅拌好再走。伙计肩挑一根扁担，挑着两木桶水，送一趟大概只要几分钱。灌满一个大水缸，往往需要伙计挑上几趟。

新中国成立后，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家家户户开始有了烧煤的小炉子。烧煤的小炉子操作起来可比农村土灶简单多了，炉子上做壶热水也方便。水铺的生意也就慢慢地清淡了。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公私合营后，水铺维持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赶上“大跃进”，这时候杨柳青所有的水铺都停业了。

西渡口黎记包子铺

天津人爱吃包子，天津的包子也有十足的特色。有一个流传于平津地区很久的笑话，足见天津包子多汁的特色：两个不相识的人，拼坐在同一张桌子吃包子。其中一位一口咬下去，包子里汤汁直飙过去，把对面客人喷了个满脸花。肇事的这一位并未觉察，仍旧低头猛吃。对面那一位很沉得住气，不动声色。包子铺的伙计在一旁看不下去了，赶快拧了一个热手巾，给客人送了过去。被包子汁喷了满脸花的客人徐徐答道：“不忙，他还有两个包子没吃完。”

多汁的天津包子在杨柳青是让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小吃。杨柳青的包子最出名的有西渡口黎记包子、大寺胡同邢记包子、河沿大街石家庄西的梁记包子、“三不管”地的耿记包子等。但味道最好，让人们至今难忘的还属黎记包子。

杨柳青掌故老人王鸿书家住杨柳青西渡口胡同。新中国成立前，他的父亲在胡同东面的自家住宅经营永德昌线铺，而黎记包子就在西渡口胡同的西南角。两家同住一条胡同，是关系非常好的邻居。

西渡口胡同是杨柳青镇很有名的一条胡同。西渡口位于杨柳青中部，席市大街南侧，南起运河故道，北至席市大街，中与河沿大街相交。

长 67 米，宽 3.8 米，最窄处 2.6 米，两侧为砖木结构平房，土路。相传于清乾隆年间形成。因直对西渡口，故名。

西渡口的黎记包子铺，老掌柜叫黎广，杨柳青人习惯称呼他黎黎广。一说黎记包子就是黎黎广的包子。有资料说，黎记包子始于清代，但据王鸿书回忆，黎记包子应是从清末民初开业的。新中国成立前的黎记包子铺没有门脸，摆摊经营，有锅灶、笼屉、条案、凳子、旱伞等。

王鸿书家的永德昌线铺距离黎记包子铺摆摊的地点比较近，故而黎记每天收摊后，就把摆摊的用具都寄存在王家。因这层关系，王黎两家非常熟悉、关系也很亲近。黎家每到端午节就给王家送自家亲手做的粽子，春节送自家做好的包子肉馅。

黎记包子的第二代掌柜叫黎玉华，是老掌柜黎广的五儿子，杨柳青人习惯称其为黎五爷。新中国成立后，黎五爷租了西渡口胡同西南角的长条屋做门脸。1956 年公私合营，杨柳青的包子铺全部改行，黎五爷改卖猪头肉了。20 世纪 80 年代，黎五爷在杨柳青北门附近重新经营起了包子铺，招牌仍然是“西渡口黎记包子”。到 90 年代，黎记包子铺搬到了光明路东侧的底商。21 世纪初搬到了广汇园底商。广汇园时期就是由黎五爷的两个儿子经营了。

黎家的包子香飘百里，不仅在杨柳青有名，就连天津城里的人都知道杨柳青有个黎记包子铺，那叫一个好吃。很多市里人专程跑到杨柳青吃黎记包子，说比“狗不理”还好吃。王鸿书觉得这是因为黎记包子铺真材实料，从不偷工减料，再加上独特配方，赢得大伙儿的认可。

黎记包子铺的馅料配方是黎家的秘密，概不外传。王鸿书因缘巧合下偶然得见包子馅的做法。如今，黎家已不再开办包子铺，王鸿书这才愿意公布包子馅的做法，给大家的餐桌添

道美食。

据王鸿书讲，地震那年（1976 年），杨柳青做泥瓦匠的邢家帮王家修防空洞。邢家与黎家是亲家，黎家就帮开工的邢家做饭。“黎家包包子时，恰好被我看到肉馅的配料以及配比。配料包括鲜肉、香油、葱、姜、大料水等，而配比有独特的讲究。我自己按这个配方包包子也非常好吃。”

包子馅的配馅和拌馅是有学问的。首先，猪肉必须是新鲜的，质量差、不新鲜的肉绝对不能用。精选后的肉手工剁成馅，绝不用机器搅馅。做肉馅不能是纯瘦肉，那样的话，口感发柴并不好吃，但肉馅的肥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夏天天气炎热，人们往往吃不下油腻的食物，所以猪肉馅大概是肥三瘦七，春秋两季天气宜人，猪肉馅大概是肥瘦各半。北方的冬天天寒地冻，人们需要更高的热量来抵御寒冷，猪肉馅就改成肥六瘦四。这也是黎记包子为啥一年四季都好吃的原因之一。肉馅的作料配比更不能马虎。如大料、香油、葱、姜等都有自己的标准。一斤肉馅放一两酱油、一两五钱香油、二两半葱、一两姜。这些配比不能含糊，用眼看凭经验放是不行的。据说老掌柜黎广是严格遵守用称量的。肉馅还得放高汤，一般是猪骨熬成的高汤，大概是一斤馅半斤或八两高汤。

旧社会没有冰箱，老掌柜黎广和好肉馅后要用冰块镇上，一是保持肉馅新鲜，二是让汤料凝固，可以包进包子。包子是个技术活，讲究的是皮薄、有嚼劲，绝不能出现掉底、塌帮、跑油。

从民国摆摊起家，到 20 世纪 90 年代，杨柳青西渡口黎记包子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即使如今已消散在社会进程中，杨柳青人仍然记得这一独特的美味。

（供稿单位：南开区档案馆）



明代徐光启在津南农事活动及其意义

张存信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明代南直隶松江府徐家汇人（今上海市区），生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卒于崇祯六年（1633）。二十岁考取金山卫秀才后，经历二十三年始考中进士，在这段时间内，边教学，边关心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参加田间劳动接近农民，在生产实践中淬砺实事求是科学态度。后到北京，与李之藻^[1]同学西方科学知识，利用科学技术成果，力图改革以富国强兵。徐光启关心现实，将科学理论和科学实验结合起来，考取进士后任翰林院庶吉士，时利玛窦^[2]在北京，同他一起研究天文、历法、数学、水利、地学等，共同翻译《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泰西水法》等科学著作，故又是一位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先驱。英国著名中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Dr.Joseph Needham, 1900—1995）在纪念徐光启逝世350周年大会来电中说：“我们高度评价徐光启把科学革命取得新的实验主义的科学成果传播到中国，有无比重要的世界意义。”

调研京畿屯垦意义

徐光启处于明王朝摇摇欲坠之际，政治腐

败，经济凋敝，水利失修，四境不宁。沿海倭寇之患，北徽宣大之警。辽事告急，明军在作战中屡次败北，防辽士兵粮源不畅，处于半饥馑状态，人民因连年天灾人祸，岌岌不可终日。故他提出“务农贵粟”和“屯田”办法；在北方开垦与引种各种粮食作物，以扭转“南粮北调”。对不合理现象，又写“漕河议”，疾呼：“漕能使国贫，漕能使水贵，漕能使河坏。”因漕运使东南粮以供京师，民费数石而等一、二石，使东南人民贫困，春旱漕河夺农田灌溉用水维持通航，秋涝则放运河水泄洪淹农田。运河穿过黄河，如治理不善也易发生水灾。故他到津南地区开垦，有崇高理想为指导。但想到其前徐贞明、汪应蛟曾在京畿屯垦，先后遭遇阻挠而中止时，又产生顾虑，故《农政全书》载：“东南转输，每以数石而致一石”等语，特别加注：“此条西北人所讳也，慎弗言，慎弗言。”（《农政全书》卷十二，以下《农政全书》略，仅写卷数）他五十二岁时托病来津，从万历四十一年至天启元年，先后四次在津南屯垦，整理前人屯田经验，“随时采集，兼之访问”。（《凡例》）购

[1] 李之藻（1566—1630）与徐光启志同道合，同治算理、天文等科学，同介绍西洋科学技术，同信天主教。

[2] 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明末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于万历十年（1582）奉派来华，初在广东肇庆传教，万历二十九年到北京并与徐光启等士大夫交往，徐光启向其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二人合译《几何原本》等。

置田产，进行南稻北移和水利实践活动。他看中海河干流贯穿天津滨海平原作开垦荒地，具备兴水利作试验田优势，选葛沽与咸水沽间海河干流中下段右岸，遴选荒地不可能到葛沽，因“静海之葛沽高地皆已田”。（卷十二《水利》）其家书曾提，购有麦田八百亩。水旱约各半，由此推测在津滨海营田为一千五百亩至两千亩^[1]，百顷可能性很小^[2]。王重民先生认为徐光启在津南土地有一千六百至两千亩可能即按此估计出。该屯田必散在沿河和依托集、镇，便于粮食运输出售和深加工（酿酒），故可能坐落于津南咸水沽旧海河弯一带。该弯在1913年取直后已淤废（海河工程局第四次裁弯）。他所说近“大江”两岸，定为从天津三岔河口汇集入海的海河干流。再按田产价格，一两可得十几亩到几十亩。绝非良田，而是近海沮洳和重盐碱地，头一两年内未完成筑围和开沽道引水前又多难以收效，可证明屯田地是海河干流中下部地区无疑。在白塘口以下“为静海县民地。或五亩、十亩，而折一亩”。（《明实录》万历二十九年十一月）

徐光启来津屯田，重视前人水利屯田文献，对袁黄编《宝坻劝农书》^[3]中部分，曾亲自手录。但决不盲目追随，而有批判地继承。他远称元代虞集，近推崇和他同代徐贞明、汪应蛟等人所洞察到“南粮北输”是对东南“竭

泽而渔”，倡导兴修西北水利，以求“兵食就地自足”见解。对徐贞明《潞水客谈》一书，尤为推举，将其录入卷十二《水利》中。虽有“北方之可为水田者少，可为旱田者多，公只言水田耳，而不言旱田”评语，但肯定徐贞明水田方面的成就。他于《潞水客谈》序中，称徐贞明倡议所收实效：“至今渔阳、督亢之间，咸享其利，直欲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并称徐贞明著作为“三百年来无有”。他在录前人文献时，对其中某些观点不能苟同，就用“玄扈先生曰”加以评论，此为《农政全书》引人注目特色，可看到他尊重科学，不泥前人和实事求是精神。

解决土肥水种问题

徐光启四次津南屯田，推行在西北兴水利开垦夙愿，先在咸水沽示范。天津位于海河水系尾闾，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退海成陆形成平原，多为斥卤之地，垦殖大半是撂荒地和生荒地，耕作技术上主要矛盾是水，其次是肥，更重要的是水、肥配合。故着重广泛调研各种水利措施和试验肥料品种、积聚、制造和施用方法上问题，并在实践中检验和比较。他写《北耕录》一书，其残存部分可能是《粪壅规则》，乃我国传统农业对肥料学有深邃研究著作，全部内容并未录入《农政全书》中。在用肥上吸

[1] 王重民编：《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 查继佐《罪惟录·徐光启传》：“盖欲身试屯田法，因就疆里数万亩，后草《农政全书》十二卷以闻，本此。”说明《农政全书》的部分内容“脱颖而出”主要是出自津南农业实践，与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编入水利等章中。《农政全书》崇祯己卯（1639）平露堂刊本。张国维、方岳贡编印，是现有各种版本的祖本。

[3] 袁黄，字坤仪，号了凡，浙江嘉兴人，万历十四年进士，曾任宝坻县令，“袁黄为宝坻令，开疏沾道引扉潮河于壶卢窝等村，教民种稻，刊《劝农书》一卷（于万历十七年刊行）。详言插莳，灌溉之方，盖湖水性温，发苗最沃，一日两至，不失咎刻，虽少雨之岁。灌溉自饶”。（乾隆《宝坻县志》）明代宝坻县包括今天津市区和东丽区部分，宁河县、宝坻县、塘沽区和汉沽区等，辖区占天津平原1/2。清初后宝坻县已不包括沿海，成为内陆县。



取宝坻县袁黄经验，对各种肥料效果亲自试验，并做记录。《粪壅规则》云：“天津海河上人云：‘灰上田惹碱’，吾始不信，近韩景伯庄上云：‘用之菜畦中果不妙！吾犹未信也，必亲手再三试之乃可信耳’。”

他于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初到天津，用南稻（种）种田，师（学习）孙彪用于大粪每亩八石，是年稻，科大如碗，根大如斗，而含胎不秀，竟不收”。是因当时不可能有水稻与光照反应的知识，不知南方水稻品种是短日照下开花结实，移种北方后，夏季日照大大延长，不符合短日照客观条件，故水稻停留在“含胎不秀”阶段，再加以用人粪过量，引起贪青疯长，这种科学道理，还是难以通晓，丁巳年（万历四十五年）“每亩用麻糁四斗，是年每亩收米一石五斗，科大如酒瓶口”。（《粪壅规则》）经过两年的试验，南稻北移终于成功。

他对天津屯田经验有选择采纳，同意天津屯兵云“大地新开与开荒同”，另对“用麻糁亩官斗五斗，若用干粪得甘石似太多，难听从耳”，还特别加注说：“用甘石，此不知者之言也。”并对南北施肥异同曾做仔细观察：“北人种菜，大都用于粪壅之，故根大；南人用水粪故十不当一。又新传得芫菁种，不肯加意粪壅，二、三年后，不知择种，其根安得不小。”（卷二十八《树艺》）而“北土用熟粪……热蒸已过，然后用之，势缓而力厚，虽多无害”。

（卷三十五《蚕桑广类》）

他对水利和农业关系有深刻认识，指出农田产量不高，“其不能多生谷者，土力不尽也；土力不尽者，水利不修也”。只有兴修水

利，才能挖掘土地潜力，“北土之田尽垦，则国富兵强久矣”。（卷八《农事》）他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认真总结我国传统农田水利经验用于垦田，尤其重视小流域开发和水资源合理利用。他购置约二十顷田产，其中一半近海河干流，地势较低，筑岸即作围田，天津围田情况，在乾隆《天津县志·附营田》载：“天津营田全资潮汐，一面滨河，三面开渠与河水通，潮来渠满则闸而留之，以供车戽，中间沟塍地埂，宛转交通，四面筑围以防雨涝，皆前明汪司农应蛟遗制也。”

明万历宝坻县令袁黄《劝农书·释围田》载：“筑土围之，环而不断，随地形四面各为大岸，其中又有小岸，岸下有沟，以泄水也，外水护内皆稼地矣。”“围田，筑土作围以绕也，盖江淮之间，地多薮泽，或濒水不时淹没，妨于耕种，其有力之家，度视地形，筑土作围，环而不断，内容顷亩千百，皆为稼地。”（卷五《田制》）围田是江南耕作制，兴建投入劳力巨大，主要防涝。海河干流下游地势低，汛期雨量和上中游客水同时集中，两岸常决堤漫溢，洪涝交加，无大规模防洪工程前，用戍守士兵筑“围田”防洪涝，有积极意义。在滨海盐碱地上种稻，他特别重视水利措施：“稻田用水，随时随地不拘一法，括之以两言，曰：‘蓄与泄而已’。”（卷廿五《树艺》）就灌溉操作方法：“灌田者，先须以水遍过，收其热气，旋即去之，然后易以新水，栽禾无害。”（卷二《农本》）天津滨海种稻，“蓄”“泄”是管理关键，至今，“拉荒”（洗碱），抄、耙等操作技术仍沿用。不仅注意水利措施对改造盐渍地作用，并总结因地施肥重要性，《粪

壅规则》载：“天津屯田兵言：碱地不害稻，得水即去，其田壮亦与新田同。但葛沽屯田兵又言：初年碱地不宜稻莳，下多不发，二年以后渐佳，后来更不须上粪，尤盛不碱者。”他分析天津近海重碱地初开不宜稻，不外乎碱重，洗碱不够（水利不到）等。因“濒海之地，潮水往来，淤泥常积，碱草从焉，挑沟筑岸，树立桩橛，抵潮汐也。其田形中央高，两旁下，约可十余丈即为小沟，百数丈即为中沟，依次加展以注雨涝谓之‘甜水沟’，曰‘甜水’，取其能刷碱也，斥卤尽乃种稻”。（乾隆《宝坻县志》卷六《集说》）灌溉方法大都用蓟运河和海河干流潮汐河道特点，涨潮时引入灌溉，退潮时排出尾水，如此循环往复，即可不断降低土壤盐分，但其主要缺点不能把灌、排水渠分开，往往把排出的咸水（二淋水）又灌回田里，不能很快降低土壤中盐分。

气候水土特点利用

徐光启据华北滨海平原地貌和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安排农作物，意见是：农民在天津平原洼地易涝区常种低产高粱，“数岁而一收，因之困敝，余教之多艺麦”，该地夏秋之际受涝，涝后能疏水种秋麦，难疏水则种春麦，“春旱则引水灌之，所以然者，麦秋之前，无大水，无大蝗，但苦旱耳，故用水者必稔也”。（卷十六《水利》）“种春麦并杂旱稗，刈麦后长稗，即岁再熟矣，稗既能水旱，又下地，不遇异常客水，必收”。（卷廿五《树艺》）即天津平原一水一麦地区，避开汛期，水过留淤，不粪而肥，有“一麦顶三秋”之谚。他在京津多年，掌握这里降雨规律，海河平原年平均降雨约500~600毫米，历来春季少，仅占全年的

8%~10%，春季温度上升快，大风多，尤其沿海土壤结构差，又缺乏有机质，土壤持水性低，而毛细管上升容易，故常发生春旱，而夏秋之际雨量集中，六至八月份常占全年雨量80%，低洼地区又常发生洪涝。华北平原雨量特点是既患寡又患不均，他在津垦田期间对这种气候特点深有感受，认为水资源缺乏，华北开垦只注意水田不够，更主要在旱作农业。因地制宜地进行水旱兼作，并从垦田实践中总结出防旱保墒，节水和绿化荒原，是北方发展农业根本措施。卷廿六《树艺》载：“北方多苦春旱，区种者尤便灌水，今作畦种法，其便宜倍胜区也。”卷廿八《树艺》载：“畦种水浇，何必须连雨乎。”仅节水还不够，关键保墒，即土壤蓄水。卷廿六《树艺·种麦》载：“谚云：‘冬无雪，麦不结’……雪可必乎！秋冬宜灌水，令保泽也。”华北平原春季，常年多旱，就需灌溉水，人为在土壤里储积水分，以补充自然降水不足。自古华北冬麦地区有冬灌习惯，冬灌可调剂土壤温度，保护冬小麦安全过冬，增加水分，供小麦返青用水，他提出农田积雪。“北方斥卤之地，最宜积雪，地方多春旱故也。”（卷六《农事》）“无草木不待雪，无雪悉宜浇，凡草木冬植者，皆以乾不以寒也。”“四月亢旱，不浇则不长，有雨则不须，四月以前，虽旱亦不须浇，地实保泽，雪势未尽故也。”（均见卷廿八《树艺》）天津平原自古有园田“打冻水”习惯，秋收后，人和机具较闲，转向打冻水，春旱秋抗，这时丰水期刚过，地表和地下水皆有储备，故云：“春雨难期，必需籍泽。”（《齐民要术·胡荽》）他对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旱作农业思想继承并发展。卷廿五《树艺·谷部上》对谷类保墒措施



叙述具体，是从实践中得到。“春风冷生迟，不曳挞，则根虚，虽生辄死；夏气热而生速，曳挞遇雨必坚略其泽，泽多者或亦不须挞，必欲挞者宜须待白背，湿挞令地坚硬故也。”

气象旱涝虫害防治

徐光启在津南时注意“潮患与东南等，特未飨其利，故未睹其害耳，惟初秋之潮，挟风雨而至者，则西北所少，西北之雨多在伏、秋之间也”。（卷十二《水利》）反映渤海西岸仅有大潮而没有大面积向岸风，就不能引起风暴潮发生，如两种因素具备，加上伏秋之间暴雨，则可形成更加厉害风暴潮。大风暴潮后，海水淹没农田，使沿海土地严重次生盐渍化，经多年雨季集中暴雨天然淋洗，逐渐脱盐后才能种植，其过程需二三年以上。经常发生小风暴潮，则能使沿海碟形洼地积水。五大河集中海河水系尾闾客水也常在沿海沼泽洼地蓄聚，芦苇杂草丛生，旱季蒸发干涸，故渤海湾西岸碟形洼地自古即为蝗蝻孳生地（今津南、大港和七里海）。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鲍丘水》载：“泽野有九十九淀”，即对这种平原洼淀星罗棋布地貌写照。

万历四十三年，畿辅飞蝗蔽天，旱魃异常。他适遇此灾，“田间小民，不论蝗蝻，悉将煮食，城市之内，用相餽遗。亦有熟而干之，鬻于市者，数文钱可易一斗。食之余，家户困积，以为冬储，质味与干虾无异。其朝哺不充，恒食此者，亦至今无恙也。而同时所见山、陕之民，犹惑于祭拜，以伤触为戒谓为可食，即骇然……”（卷四十四《荒政》）天津滨海平原渤海蝗区为我国大蝗区之一，他在此垦田数年，故对蝗虫习性生态，发生时间和地

点，提出一系列正确认识。他分析我国明万历前发生 110 次蝗灾，对蝗区描述，及“涸泽者，蝗之原本”论断正确。提出治蝗方法，是刈除涸泽杂草务尽，必须用人力及时防治。他在前人治蝗基础上，对蝗害进行广泛观察，其深刻细微之处，主要是对历代情况和南、北异同做分析与总结，并追踪蝗虫生活史，提出根治措施，万历四十三年和四十五年，北方的大蝗灾不仅耳闻，并且亲历了，自“万历三十三年北上，至天启元年南还，十七年之间见蝗灾者六，而莫盛于丁巳（万历四十五年），是秋奉使夏州，则关、陕、邠、歧之间，遍地皆蝗，而土人云：百年来所无也”。（卷四十四《荒政》）故他提出：“旱非不惧，其所伤不如涝多耳，旱而蝗，大可惧也，而蝗又生于涝也。”（卷十二《水利》）《农政全书》中占比重最大是《荒政》（从卷四十三到终卷六十三），其他章节也贯穿这个精神。他在津引种南桑、番薯和编《农遗杂疏》与在《农政全书》后附朱描《救荒本草》（1404）和王磐《野菜谱》，均本此。这与他生活时代旱涝连年，蝗灾遍起，人口大量损耗分不开。故：“明祚之盛，弘治称首，其衰则自万历。”（陆陇其编康熙《灵寿县志》）

他在津南屯田成功“三年大获其利”。（《凡例》）但受到条件限制。崇祯三年上疏条陈“垦田、用水、除蝗等纲领五端”。第一篇《垦田》条目凡廿八，第二篇《用水》条目凡六，第三篇《除蝗》凡九，多在津屯田体会。因辽事紧急，兵马倥偬，未能实现。

中西科学结合应用

徐光启是我国最早一批向西方寻求真理的

先进人物之一，尝试西方科学纳入中国文化，为我民族寻求发展道路。尤其从历史角度探讨区域水利演变规律。他不是从事著述学者，也非遵循中国传统追求“人格完满”学者。他引进西方水利技术，并善于同我国特点相结合，曾向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学习泰西水利，所学笔记编译成《泰西水法》，其目的为兴修水利开垦农田，《凡例》中云：“泰西之学，输墨逊其巧矣，水法数卷，采其有裨于农者。”在津屯田期间：“躬执耒耜之器，亲尝草木之味。”（《凡例》）既重视传统农学经验，又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亲自参加制造新式灌溉机具，天文仪器及兵器等。对欧洲传教士带来西方科学采取正确态度，既不排外，也不盲崇。难能可贵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即汇通中西，以彼之长，补己之短。其所持“真治田，即是井田之法，舍此别无法矣”。（卷十二《水利》）与《井田考》载：“北方正可井田，正可如古人之制，但不必限田耳！”以恢复井田沟洫制来调整土地关系和解决旱涝问题所束缚，故其“欲求超胜”宏愿，注定不能实现。他和当时少数学者曾尝试把中西科学结合起来，但“昙花一现”以悲剧而告终。因我国知识群体把西方技术定位仅局限在儒学价值观范畴内，无法借鉴西方文化深刻内涵。综上所述，徐光启学习

欧洲天文、历算、测量、水利等知识，也有自己关于历算、测量方面著述如《测量异同》《勾股义》等，后多融于其力作《农政全书》，这是我国最早将西方科学融入传统农业的学术著作。

崇祯二年，徐光启临终前四年六十八岁时，在京撰写《重修天津卫学宫旧碑记》追记在津屯田时情景，“余曩侨寓津门，有事畚插之役，与津之诸士绅游”。（康熙《天津卫志·艺文》）他关心生产，接近人民，生活朴实，为国家富强奋斗，确实代表当时这个阶级先进人物，成为一位伟大爱国科学家，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融入西方科学，做出他的最大贡献。

他晚年位级显赫，仍不易旧风，廉洁奉公。张溥《农政全书》原序中说，“……登政府日，惟一老班役衣短褐厚衣，应门出入传语。易簾旅舍，囊中不盈十金。古来执政大臣，廉仁博雅，鲜公之比”。他勤奋廉洁精神，主要应从他一生实践活动来探求。“公逝世后，家人检其卧榻，发现褥上破烂一穴，世，盖公自成化（午）还召及癸酉谢世，未尝携家自随。一榻萧然。帐帷有褥……祁寒独宿，（每）夜（只）用汤壶暖足。”^[1]他毕生保持廉洁、朴素生活作风，为祖国兴盛和科学发展而“鞠躬尽瘁”一生。

（作者单位：天津市种子管理站）

[1] 梁家勉编：《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注] 万历四十一年（1613），徐光启因修历事为朝臣不满，十月十一日托病请假首次来津屯田，至四十五年田事筹划告成，尝来往京津间。该年七月十一日奉命往夏州（宁夏），十月八日返京，长途跋涉，不久以病归津门。看到南稻北移成功，次年六月后与病入都，这八个月的时间，认为他是第二次来津。第三、四次为天启元年二至四月，和九、十月间再寓津门处理垦务。至于从水利角度看，“水利农之本也……玄扈尝试于天津，三年大获其利”，（《农政全书·序》）是说徐光启在其荒碱洼地上完成农田水利工程后，连续三年大获其利。至于他在津南亲历田亩时间可达五年之久。



历史上的宝坻水运

王宗征

地处渤海之滨的宝坻，历史上因九河汇聚而著称，境内河流众多，水运发达，是我国北方漕运重要交汇地之一，形成河运与海运的连接和融合，构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运输网。在陆路交通尚不发达的时代，由于水路运输有运量大、成本低、航程远等特点，多水近水的地方均籍舟楫之便，宝坻占据了这方面的优势。

历史上的宝坻一带地域，行政管辖区域界限以及地名多有变化，域内自然形成的河流和人工挖掘的运河较多，从而使水运的发展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据宝坻水利史志资料记载，这里古河流众多，运河多有开凿。东汉末年，汉将曹操在官渡之战战胜袁绍后，率军远征乌桓，当时宝坻一带属于泉州管辖。建安九年（204），曹操打败袁绍之子袁谭割据势力后，平定了幽冀之地，宝坻一带列入曹操管辖的地域之中。建安十二年（207），为彻底肃清袁氏残余势力，曹操再次北征乌桓。此前一年，为了将兵源和粮草等军用物资运输到前线，曹操征调民工疏浚运河，开挖了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三条水道。其中泉州渠北端在相当于今宝坻境内，汇于鲍丘水（今泃河），南端则在今天的天津市区，交于潞河（今海河）。曹操还下令，从泉州渠入鲍丘水处沿散流的鲍丘水河道修筑双堤，使其向东南方向延伸至张头窝，与巨梁水接通，转向东北方向，再与滦河、青龙河连通，直达乌桓老巢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南）。泉州渠还与平虏渠、新河互相连接，形成较为完备的水路交通体系。可以说，泉州渠是宝坻境内有记载的水路运输发端。

西晋以后，国家一度陷入分裂，漕运也在宝坻中断，然而民间水运尚存。隋唐时期，随着国家统一和强盛，漕运业再度兴旺起来，宝坻漕运也得到迅速发展。那时，封建朝廷曾在相当于今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一带设立海口，用于停泊漕船，屯储军粮，从海上来的漕船，必经今宝坻境内的泃河（古称鲍丘水），方能到达渔阳（今天津市蓟州区）。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在河北道支度营田使姜师度主持下，从军粮城沿东北方向，开凿了一条与海岸平行的渠道，直通鲍丘水，也称平虏渠。从此，由我国南方来的漕运船源源北上，经宝坻北达渔阳。当时，唐代大诗人杜甫曾赋诗描绘这一带的水运盛况，他在《后出塞》写道：“渔阳豪侠地，击鼓吹声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赵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在《昔游》中又写道：“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凌蓬莱。”

唐朝中期“安史之乱”发生后，我国北方陷入藩镇割据和边族侵扰的战乱之中，包括宝坻在内的北方许多区域漕运受到极度影响，处于停滞状态。五代十国兴亡交替之际，后唐大将赵德钧受庄宗李存勖之命，出任卢龙节度使。李存勖任职期间，在沿海芦台（今属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卤地设置盐场，实施煮盐、晒盐，并舟行运盐于幽州（今北京）。运盐过程中，李存勖在当时的武清县境内看中了相当于今宝坻城区一带的“高阜开阔”之地，认为这里地势高阔，水运条件优越，适合作盐的储藏地和转运站，便在这里设置榷盐院，作为官府管理盐

务的专门机构。不仅在此贮盐，还把盐运销到多个地方，并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新仓”，这里也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大盐仓”，以运盐为主的漕运业因此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后唐清泰三年（936），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起兵造反，为后唐大军围困于太原，遂向契丹求援，并建立小朝廷，史称后晋。石敬瑭甘做“儿皇帝”，割幽云十六州给契丹，宝坻一带区域属于幽云十六州一部分，此时漕运没有受到较大破坏，仍然较为发达。

到了辽金时期，宝坻一带的水运，运盐和运粮都很突出，水上运输业十分兴盛，宝坻水运的作用和位置也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公元10世纪左右，辽国的实际统治者萧太后为从海口（今天津市军粮城一带）运粮北上之需，特地开凿运粮河，形成水上交通主干线，史称“萧太后运粮河”（又称萧河）。萧太后运粮河自海口北上入宝坻，沿今境内大山庄、林亭口、王卜庄、石桥、新开口、大口屯一线航行，将军用粮食运至大口屯（今天津市宝坻区大口屯镇），储存于此，以备军需。

金统治时期，金世宗下诏，撤新仓镇，改置宝坻县，由此县境水运更加繁盛起来。金统治者从直沽（今天津）沿水路运往中都（今北京）的“皇粮”多由宝坻河道经过。据宝坻史志工作者研究分析，金代水运鼎盛的宝坻，境内有盐粮运输航道6条之多：（一）由芦台北塘口上溯，经七里海潘庄，至鲫鱼淀，入黄庄洼南、北场码头、大、小辛码头、牛蹄河、黑狼口、三十家子、蛤窝、泗河、口东，再由节流水关入城至泮池，经榷盐院检查缴税后，通过穿城河，出开源泉水关入百里河西上，过香河达通州再上溯顺义、密云，入潮河白河，可达塞外；（二）由黑狼口分航西行，经西庞河口、河北庄，过中登、庞桥头、秦各庄、闫各庄，再过小河口、小哨口，入香河蒲池河，再

西入高粱河，达大兴、宛平，转入桑干河，直通山西各地；（三）由杨码头分航西行，经朱家窝、西老鸭口，入绣针河，再到白庙村，入北运河，向西转入永定河去安次、固安，向南转入大洼河、子牙河，可去河间、保定，再向南，入南运河，通往南方各地；（四）沿泃河（故道），从榷盐院前泮池北行至开源泉水关，走曹魏泉州渠，到三岔口转泃河溯水行，进入三河、平谷，达蓟州北黄崖关；（五）由泃运河新安镇以东曹家口处分航，到达蓟州城南，再东行至遵化州；（六）即鲍丘河（故道），由西河务村向西，可行至三河、顺义、密云等地。可见，宝坻是辽金时期水路运输的重要始发地或主要中转站，因河道纵横贯通，航船可到达四面八方，水运“放射线”越伸越远。

金灭宋以后，天津被称为直沽，三岔河口成为漕运的重要枢纽，宝坻仍是皇粮运输的必经之地。当时，水运皇粮主要由民间的船户来承担，每30只船编成一队，称为“纲户”（后称网户）。宝坻境内从事皇粮运输的“纲户”较多，至今宝坻境内沿河区域仍有村庄为“网户庄”的村名。

元代以后，海岸线逐渐下移，宝坻煮盐业受到严重影响，盐业重心也发生了转移，宝坻水路运盐走向了衰落。但是，在陆路交通尚不发达的时代，凭借河流众多的有利条件，宝坻水运仍然兴旺。特别是泃河水运，比以前更加繁忙了。到了明代，与宝坻相邻的蓟州，成为防御边族侵扰的前沿阵地，每年从江淮地区漕运往蓟州的粮食多达350万石，这些粮食都要通过流经宝坻的泃河运抵蓟州。清朝自顺治帝开始建造东陵，需要大量建筑材料，而且多由水上运输。砖瓦木石等建筑材料多靠泃运河运抵陵区，泃运河宝坻段航船不断，水运十分忙碌。到了民国时期，宝坻境内水运河道仍以泃运河为主，其中新安镇以下至北塘海口河



段可通行运量百吨以下的大船，新安镇以上至白龙港河段可通35吨以下船只，并可入泃河去三河县。再有，宝坻境内的箭杆河及其上游窝头河王卜庄至胡各庄段，可通50吨以下船只。还有，青龙湾河树尔窝以下河段也可供运输船只通行。日伪时期，经蓟运河的日本小火轮客运，经过宝坻河段，往返于蓟县、天津之间，水路运输占据重要位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隶属于河北省的宝坻县，民生日用品、工业用煤炭以及粮食、布匹等大宗物资先由火车、胶轮畜力大车运至宁河县芦台或者玉田县鸦鸿桥，但当时公路交通条件还很落后，将这些物资发放到位，主要还是水运。当时，运载这些物资的航船经还乡河、蓟运河运抵宝坻八门城、林亭口货栈，再转运至宝坻其他地方，可见水运在宝坻交通运输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

1959年，宝坻在蓟运河沿岸的九王庄（今天津市宝坻区霍各庄镇九王庄村）正式建立航运站，并建立了宝坻县造船厂，运输船建造以木材、芦苇为原料，外涂沥青或油漆防水，每条船可载重百吨以上，这个造船厂为宝坻以及周边县域的水运实力提升起到很大促进作用。当年11月，河北省唐山专员在九王庄召开河道航运现场会，观摩宝坻造船和水运业，推广宝坻的经验，还把宝坻推选为河北省航运先进代表，出席在陕西西安召开的全国交通会议，并做了典型发言。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宝坻的造船和水运走在了全省的前列。

由于历史上水运发达的带动，宝坻境内码头众多，航运河道的码头很常见。如位于宝坻黄庄洼一带的小辛码头、北辛码头、南辛码头等，都是辽金时代依托萧太后运粮河而修建的转运码头。此外，产生于水运时代的渡口（又称摆渡）成为宝坻历史上水运行业不可或缺的补充性设施，是水路运输与陆路运输相结合的

产物。旧时，宝坻境内蓟运河、青龙湾河等较大河流，在与陆路相交又未架设桥梁之处，多设有渡口，渡口由官府打造船只，指派河畔乡民充当船工，并规定渡船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更换新船。据清乾隆十年《宝坻县志》记载，蓟运河宝坻段沿岸设有五处渡口，分设在新集、白龙港、北潭、新安镇、张头窝五个地方，其中以新安镇渡口最为繁忙。

历史上宝坻水运的兴盛发达与宝坻河流众多密不可分。从古代到近代，宝坻一带既有多条人工开凿的河渠，也有自然形成或者经过人工治理后的河道，它们都是水路运输的重要航道。水运发达时代，宝坻的河道人来船往、帆樯林立，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宝坻水运的发达，也带动了当地以及周边地区商贸流通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集聚效果和辐射效应。早在东汉时期，因曹操开渠，作为漕运交汇地，宝坻一带商贸流通很繁华。五代后唐时，榷盐院的设立和水上盐运发展，作为“新仓”的宝坻一带，成为商贸重镇，四方商旅汇集于此，可谓富商大贾货置丛繁，交易很红火，他乡人来此，多“以米易盐”为大宗。金大定十二年（1172），宝坻置县，隶属中都路大兴府，属于京畿要地，因其水运和商贸发达，被列为“上县”，著于版籍。那时，宝坻县城市井繁荣，人烟繁庶，呈现“云屯四海之行商，务集百城之常货”之旺态，宝坻知名度也不断提高。明代，宝坻的银鱼、紫蟹、芦苇等土特产品闻名遐迩，其中银鱼、紫蟹成为进贡朝廷的上品，经水路运至京城，“宝坻银鱼天下闻”盛传一时。在清代，宝坻盛产的土布、丝织品、米粮、白酒、鱼虾、大蒜、农具等手工艺品或农副产品，不仅县域内多有交易，而且通过水路运往各地，成为商贸流通中的抢手货，宝坻也因此赢得了“京东第一集”美誉。

（作者单位：宝坻区档案馆）

天津市档案馆助力后江石沽村举办书画活动 暨芦苇麦秆烙画及手工编织展览

近日，宁河区苗庄镇后江石沽村以“2022年迎盛会、铸忠诚、强担当、创业绩、答好宁河三问，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举办芦苇麦秆烙画及手工编织展览，作品出自儿童和残疾人

之手。此活动由天津市档案馆协办，并得到了区农委、区共青团委、区文旅局等有关单位大力支持。区农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民间艺术领域专家及群众共计200余人参加。



吕爱茹老师介绍芦苇麦秆烙画工艺

麦秆画是中国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是我国古文化艺术的瑰宝，麦秆画有其独到的特色工艺，是中国民间剪贴画的一种。活动现场，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数十名学生动手进行了烙制芦苇画的体验。吕爱茹、朱秀才两位老师分别对芦苇画和麦秆画进行了深入讲解，从它的历史起源到发展历程，从选材到熏、蒸、煮、烫、熨等制作工艺，从剪裁到装裱都进行了详细说明。芦苇麦秆烙画的特点是在保持麦秆自然光泽、纹彩和质感的基础上，大胆融入了国画、版画、剪纸、粘贴画等诸多艺术表现手法并巧妙地表现天地风雨、花鸟虫鱼、人物风景等内容，淳朴



郭树茂老师教学生书法绘画

自然，栩栩如生。一根根细长的芦苇和麦秆本来是麦收后田间的废弃物，但经过艺术家的巧妙加工，就成了高雅的艺术品，其惊艳程度让人叹为观止。

在谈到此次展览活动的意义时，市档案馆驻后江石沽村第一书记余辉和村书记郭树山认为，我们要利用好本村丰富的文化资源，充分调动乡亲们的积极性，让更多人了解麦秆画、芦苇画，创造更多经济价值和更大精神财富，助力乡村振兴，把芦苇画和麦秆画产业的发展与乡村振兴牢牢结合起来，为建设美丽乡村、文化乡村、魅力后江而努力奋斗！

(市档案馆人事处)



天津市统计局专题研究推进统计年鉴编辑工作

为进一步推进《天津统计年鉴（2022）》编辑出版工作，近日，天津市统计局召开编委会会议，专题研究推进年鉴编辑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全市专业年鉴编纂工作推动会精神，结合国家统计局和市地方志办关于地方统计年鉴编辑出版工作要求，总结2021年天津市统计年鉴编辑工作，讲解《天津统计年鉴（2022）》编辑方案和表式修订内容，部署“统计年鉴编辑工作进度及质量通报”工作。与会年鉴编委围绕年鉴框架、内容变化进行讨论交流。

会议强调，统计年鉴不仅是统计部门服务决策、服务群众的重要载体，更是全面展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改革发展成就的重要工具书，做好统计年鉴编辑工作意义很大。一是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围绕打造“年鉴精品”目标，

提升工作“五性”；要提升统计年鉴工作的时效性，把握时间节点，畅通数据获取渠道，提升编辑工作效率；要提升年鉴涵盖内容的全面性，向全国统计年鉴和年鉴编辑工作先进地区对标对表，丰富年鉴指标数据，发挥服务高质量发展作用；要提升年鉴内容和数据的准确性，坚持质量第一原则，严把内容和数据质量关；要突出年鉴整体性和系统性，做好各篇目之间数据关联性和匹配性审核。二是要完善机制、压实责任。认真执行并不断完善“统计年鉴编辑工作进度及质量通报”机制，共同做好统计年鉴编辑工作。三是要统筹协调、加强沟通。做好数据的收集、整理、审核、报送、校对各环节工作，遇到问题及时沟通，确保年鉴编辑工作有序推进。

（市统计局）

北辰区建立区地方志人才库

2021年，天津市北辰区成为全国唯一取得“两精两名”成果的区县，北辰区地方志办于2015年、2021年两次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评为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北辰区档案馆（区地方志办）紧紧抓住人才队伍建设是新时代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结合“迎盛会、铸忠诚、强担当、创业绩”主题学习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于2022年启动北辰区地方志人才库建设工作。

截至2022年初，北辰区镇街志、部门志50余部志书编修已基本完成撰稿，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各编修单位多为专、兼职人员相结合的工作模式，多年来以老带新、老中青结合的方式，培养锻炼了一批志书编修人才。为保障志书与人才同出，成果与经验并存，2月，北辰

区档案馆印发了建立北辰区地方志人才库的相关通知，采取个人报名、编修单位推荐等方式，鼓励热心参与地方志工作，熟悉地方志业务的社会各界人士积极申报。5月，区档案馆对所有申报者进行审核，确定入库管理70余人，平均年龄在58岁，大专以上学历60余人，研究生以上学历9人，包含了具有丰富志鉴编纂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熟悉北辰历史发展历程的退休人员以及各单位各领域涌现的青年骨干，初步形成了科学合理的人才梯队。

下一步，北辰区档案馆将根据地方志工作实际需要，组织入库人员开展业务培训、座谈交流、志鉴编修等活动，切实稳定修志队伍，为进一步加强地方志人才队伍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北辰区档案馆）

市档案馆方志指导部赴东丽区指导《万新街道志》评审 并开展工作调研

7月19日，《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道志》终审会在东丽区万新街道召开。市档案馆方志指导部负责人夏秀丽、区档案馆馆长张玉明、万新街道党工委书记吴淑波出席会议，区档案馆副馆长、区地方志办主任安战主持会议，史志专家谭汝为、戴学来、傅常欣、韩武喜、杨茂树到会发表评审意见，市档案馆方志指导部和区档案馆工作人员以及志书编纂人员共20余人参加会议。

《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道志》编纂工作自2017年正式启动，于2022年5月进入终审程序。全书上限追溯事物发端起源，下限断至2016年，共25章42万余字，主要记载了该地区的自然、人文、历史景观、社会、民生、事

业兴衰、发展变化等情况。评审专家认为，志稿观点正确、体例完备、篇目合理、内容全面、资料较为翔实、行文基本规范，全面、客观、系统地记述了万新街道在自然、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变迁，为推动东丽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符合地方志书编纂要求，一致同意该志书通过终审。

会后，方志指导部一行到东丽区档案馆开展调研，就志书编修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希望东丽区继续推进街道志、部门志的编修工作，适时开展名镇名村志申报，为东丽区宣传地域特色、助力经济发展方面做出积极贡献。

(东丽区档案馆、市档案馆方志指导部)

北辰区《红十字会志》《工会志》出版发行

近日，天津市北辰区《红十字会志》《工会志》先后完成出版发行工作，为北辰区地方志事业发展再添新绩。



北辰区《红十字会志》全书28万余字，共设11章19节，以北郊区红十字会建立的1958

年为上限，以2017年为下限，详细客观记录了北辰区红十字事业发展历程，为社会各界人士了解支持北辰区红十字会工作提供了全面系统的珍贵材料。

北辰区《工会志》在2008年首部《工会志》基础上进行重修，全书48万余字，共设9章40节，上起1953年北郊区工会建立，下迄2017年，系统记述了北辰区工会组织的发展历史与现状，为今后工会工作提供了经验和借鉴。下一步，北辰区将继续采取有力举措，持续推进区级部门志编修全覆盖，分期分批出版发行，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北辰区档案馆)

《津南年鉴（2021）》掌上年鉴正式上线

由津南区档案馆制作的《津南年鉴（2021）》掌上年鉴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掌上年鉴不但包括纸质版年鉴的全部内容，更能提升阅读体验，方便广大读者随时随地阅读年鉴，让更多的人通过读鉴用鉴认识津南、了解津南。

《津南年鉴（2021）》掌上年鉴共有35个栏目，包括彩页、大事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园区建设等内容。彩页刊登了百余幅照片，内容包括绿屏自然风光、园区建设、支援合作地区发展以及疫情防控等，生动形象地向读者展现了津南的魅力与发展。大事记按时间顺序记录了津南区全年的重要工作活动和重大事件，方便读者快速查阅了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栏目记录了疫情历程、疫情阻断、医疗救治、复

工复产复学、常态化疫情防控、抗疫保障等内容。园区建设栏目介绍了津南经济开发区、农业开发区、会展经济区重点区域建设工作，包括“天津智谷”建设、“双万双服”工作、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项目等重点内容。

扫描下方二维码或在“津南档案”公众号首页下方点击“津南年鉴”即可在线阅读《津南年鉴（2021）》掌上年鉴。



（津南区档案馆）

2021版武清“掌上年鉴”全新上线

继去年首次实现“掌上年鉴”微信小程序与传统形式同步发行《天津市武清年鉴（2020）》之后，2022年，《天津市武清年鉴（2021）》再次实行“掌上年鉴”微信小程序与传统形式同步发行。2021卷武清年鉴全新改版，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大不同”。一是外观呈现方面，实现了全彩印刷，提高了照片内容的收录利用价值，增强了阅读利用效果。二是版式设计方面，由过去两栏式改为三栏式，缩减了整体版面，降低了全书厚度，方便了资料内容的查阅利用，提升了整体美观度。三是内容创新方面，增设了“专文”“脱贫攻坚，全面小康”“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类目，其他各个类目均做出了科学调整。本次改版，

力求实现高质量的武清年鉴以“掌上年鉴”新形式更精彩地呈现。

全新上线的武清“掌上年鉴”，将更加便捷利用，更好提升阅读体验，带领广大读者读懂武清、心系武清、情注武清。



（武清区地方志办）